



在毛主席教导下

傅 連 璋

在毛主席教导下

傅 連 璋

封面图 阿老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在毛主席教导下

傅 連 璋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7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重印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020·1309 字数53,000 开本787x1092毫米1/32 印张3 1/3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沈)1-100,000册

定价 0.22 元



网站编辑制作

前 言

三十年前，紅軍解放了我的家乡——福建汀州，我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我得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組織上要我負責对毛主席的保健工作，因此能长期跟随在毛主席身边。在那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毛主席生动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結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狠狠地打击了疯狂的敌人，使革命力量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那时候，毛主席常常穿一套旧軍装，戴一頂旧軍帽，不是坐在小屋的桌旁夜以繼日地草拟指导全国人民革命的文件，就是看材料，或是外出开会，做別的工作，終日沒有休息。他那种由于对人民的高度关怀和爱护，由于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給革命事业而具有的惊人的工作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及对同志的关怀等等，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我。几十年来，我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真是我們全国人民最好的老师！在毛主席的身上，充滿了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崇高风格。

現在离那时已有三十年了。但过去的这一切，却历历在目。全国解放后，我就想把这些珍贵的材料，这些活

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材料写出来，贡献给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让大家从毛主席的作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因此，我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共有七篇文章，记下了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八年間，毛主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真实故事，各篇互有联系。故事内容大致包括：毛主席对医务工作的关怀，在他的亲自指导下，紅軍的第一所医院和医务学校創立的情况；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在病中的艰苦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及对同志的关怀，长征中毛主席的雪里送炭；毛主席如何一步一步地引导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并使我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等等。另外一篇不是关于毛主席的故事，而是南昌起义后的生活片断，我觉得对讀者也有些益处，所以也收在这本书里。

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不善于写作。幸得虞丹等同志的整理修飾，特在此致謝！而毛主席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作风，又是連最灵巧的笔也很难写得象现实那样美好、那样完全的，我的这本书只能說反映了现实的万万分之一而已。

希望讀者們指正。

作者 1959年2月7日

目 次

前言.....	1
中央紅色医务学校.....	1
中央紅色医院的創立.....	6
毛主席在零都.....	29
长征中的雪里送炭.....	43
我的入党.....	55
革命的青春.....	68
南昌起义的伤员.....	90

中央紅色医务学校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中央根据地已經巩固，过去曾經和白軍几次易手的汀州，也稳定地被紅軍控制了，成了中央根据地的一座大城市。那时，福音医院实际上早已变成了紅軍医院，經常住滿紅軍的伤病員。只是为了到白区購買葯品、訂閱报纸的便利，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的名称。

一九三〇年紅軍第十二軍軍长伍中豪同志患了急性肺炎，正在医院里治疗。每天上下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輪流来看他。有一天毛主席問我：“开办这样一所医院，每月要用多少錢？”我告訴他除原有基础外，每月只要補助二、三百块钱。

毛主席笑着說：“才需要这几个錢嗎？我們可以自己办。将来，我們还要去北京办大医院哩。”他接着又告訴我紅軍的卫生情况。

那时紅軍因为战斗頻繁，伤員增多，加之南方气候炎热多雨，瘧疾、痢疾、脚部瘡瘍，是部队最常見的疾病，而且蚊虫特別厉害，被咬之后就紅肿潰烂。部队中医务人員非常少，远不能滿足需要。

毛主席望着我的眼睛和藹地說：“傅医生，你不但自己做医生，还要替紅軍訓練些医生才好。”

当时听了毛主席的話，我沒有馬上回答。大概主席很快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当我正在低头沉吟的时候，耳边忽然又响起了毛主席的声音：

“懂多少就教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他的声調是这样温和而且坚定，那样准确地一下就揭破了我心头的顧慮。我的眼前頓時豁然敞亮了——我立刻觉得信心有了，办法也有了。我說：“好吧，我一定尽力去做！”

原来中央已經作出决定，要开办一所中央紅色护士学校。主席和我談过話后，就立刻通知江西、福建两个省政府，要各县挑选政治上可靠的有点文化程度的共青团員到汀州来。

學員很快就集中了，一共六十名，男女各半。从紅軍中調来三个残废的干部，一个担任校政治委員，两个担任政治指導員。一九三一年底，学校就开学了，校址設在汀州城內的万寿宮（江西會館）。

这批學員虽然是挑选来的“知識分子”，其实文化水平还是很低，最多的也只識几百字。因此，每天除了学业外，还特地請了地方上的一个教师来教文化。講課时，我念一句，他們才能跟念一句；念了以后，还是不懂。我心想：“这样学下去，六个月能学到些什么呢？”

一天晚上，毛主席特地来看看學員們。我順便把這些情況向他彙報了一下。

毛主席安詳地回答我說：

“挑部隊最常見的病來教，挑部隊最常用的藥來教；講不懂，就做給他們看。”

就是這麼簡單扼要的幾句話，却立刻解決了我好幾天來的苦惱。原來我還是按照陳舊的那一套公式來要求的，這當然不能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我從主席這幾句話中，体会到一種革命的精神。他既指出了教學方針，又指出了教學方法。我高興得連忙告辭他，從頭考慮了一下我的教案。於是，確定每天上兩次課，臨床實習兩次。講課中遇到疑難問題，同樣通過實際動作來說明。例如講注射方法，就拿注射器在課堂上当面注射一次，果然學員們很容易就學會了。

學員們住在萬壽宮內的破敗的房子里，睡的是稻草地鋪，穿的是從家里帶來的便衣，吃的是糙米飯，因為白軍長期封鎖，沒有鹽吃，都是用酸菜、辣椒送飯。夜里四、五個人合用一盞茶油燈。即使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他們還時常學習到夜深才睡，因此，到畢業的時候，成績都很好。

一九三二年，毛主席親自帶着紅軍在福建的漳州打了一個大勝仗，回到汀州時，恰好紅色護士學校第一批學員畢業。記得朱總司令還特地趕來參加了畢業典禮，并

且講了話。

毛主席一回來，就找我談話。他說：“現在環境更加穩定了，我們應該訓練自己的軍醫，光會塗碘酒是不行的。”

我說：“訓練一個醫生不是容易事，起碼也得好幾年呀！”

主席說：“給你一年時間。假如環境好，可以兩年。”

我立刻警覺起來：原來我不知不覺又在舊公式中兜圈子了，卻沒有考慮革命的需要和環境的條件。於是，我連忙回答主席說：“我一定辦到！”

主席和我說過不久，中央紅色醫務學校就成立了。護士學校還未結業時，一軍團、三軍團都來催着要人了。後來，畢業生大部分被分配到前方部隊中去了，留下小部分成績最好的學員，加上新招收了一批，一共二十名，這就是中央紅色醫務學校的第一批學員。

和毛主席幾次談話後，自己感到思想方法和作風都穩健得多，這次接受了這項任務，知道非常繁重，心裡却不象從前那樣緊張了。我仔細研究了部隊衛生工作的特點和作戰地區的特點，並決定在這一年的內，把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技術知識，教給他們。白天上課，夜間編講義，一共編成了外科、內科、急救、處方、藥物學、綳帶學等六種講義，都在汀州城內用石印印刷出來。這給學員們學習上很大便利。後來一、三軍團還特地把講義翻印了

发到部队里去。

我們就是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之下，为我軍訓練了第一批医务人员。二十多年来，这些同志和部队一同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有的为革命贡献了生命，其余都成了我軍卫生工作的领导骨干。

中央紅色醫院的創立

一九三二年秋天，毛主席親自帶領紅軍，在福建漳州打了個大勝仗，消滅了國民黨張貞部隊一個師。漳州離廈門只有一百來里路。紅軍的聲威，不但使蔣介石反動集團心驚膽寒，而且震驚了帝國主義，當時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艦開到了廈門港，深怕我們進攻廈門。

勝利消息傳遍了全中國，我們醫院也沸騰起來了。正在這時，陳炳輝同志從前綫回來了，他是在打漳州時派去當毛主席的保健醫生的。這一下，醫生和護士們把他圍了個水泄不通。我擠不過這些小伙子和姑娘，只得自覺地站在圈外，卷上台阶看着他。嘿！陳炳輝這小伙子已穿上軍裝了，鑲着紅五角星的紅軍帽扣在后腦勺上，帽沿高高地翹了起來，神氣得很。他臉色晒黑了，臉上沾着泥土，但很豐滿，嘴巴笑得咧開了，露出一口白牙齒。他肩上海掛了兩雙嶄新的膠底鞋，被人們一擁，四只鞋在前后擺蕩着。他忙着去握伸向他的幾十只手。

“陳醫生，前綫怎麼樣？你快給我們講講。”有個護士大聲地問。

“对啦！你快说说，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够受吧！”有人也說。

“那还用說，蒋介石的一个师給我們打得稀巴烂，师长张贞差一点給我們抓住。”

“哈哈……太好了！”大家都为紅軍的胜利兴奋得跳起来。

“小陈，你打上仗沒有？”有个医生又問。

“怎么沒打上？从战斗开始到結束，一直在前綫，就是沒有摸到枪。”陈炳輝調皮地回答。

“沒有摸到枪，还說打上仗了呢！”有人笑着在他的胸口輕輕地捶了一拳，說，“陈炳輝，听說这次部队抓了很多俘虏，你抓到沒有？”

“俘虏！”这一仗可多极了，战士们一抓就是好几个，我差一点也抓到一个。”陈炳輝伸出一个手指头，笑着說。

“你吹什么，当医生还能抓住俘虏？”又有一只拳头向他背上捶去。

“喂！你肩上挂了两双新鞋，哪里来的？”有人問。

“胜利品，敌人送給我的。”陈炳輝装得神气活現的說。大家爭先恐后，半搶半夺地拿起这两双鞋，翻来复去地看着，說着，笑着。胶鞋，本来是平常的胶鞋，但当可能在战斗中繳获这样的东西，是不多的，特別因为它是敌人送来的胜利品，大家更感兴趣。

我站在一旁，心里急着要問陈炳輝一件事，但大家七

嘴八舌，問這問那，我沒法插進去。這時見大家的注意力轉到膠鞋上去了，就向陳炳輝招了招手，陳炳輝也象心里有急事一樣，伸着脖子東張西望，在找人。一見到我，他機靈地從人縫里鑽出來，跟我走進了辦公室。

“傅院長……”

我等不及听他的話，插進去急問：“主席在战斗中身体可好？”

“主席身体还好，就是工作太紧张，精神很疲倦。”陳炳輝說。

“哦！”我似放心又不放心地應着。

“傅院長，我正要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

“什麼消息？”我問。

“主席來了。”陳炳輝笑着說。

“真的？現在在哪裡？”過度的興奮使我心跳得象打小鼓，我簡直不大相信自己的听觉了。雖然這以前我知道毛主席要到我們醫院來休養，但沒想到來得這麼快。

“是真的！我請主席在老古井旁的樓上休息。”陳炳輝也激動地說。

“哎喲！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怎麼辦呢？你為什麼不早点回來告訴我！”我又高興又着急。

“主席需要的東西很簡單，一張桌子，一張凳子，辦公用；另外有塊木板擱個鋪就行了。”陳炳輝說。

“可是……你知道，雖然主席的生活很儉朴，但他這

次是来我們这里休养,我們應該好好地招待主席才好。”

“对!对!”陈炳輝听了我的話,也点头同意了。

“你看請主席住在哪里合适?”我征求陈炳輝的意見。

“就住在老古井旁的楼房里怎么样?”陈炳輝想了想說。

老古井在北山下,这座楼房是一所病房,过去徐特立同志患病时在这里住过,现在楼上住着周以栗同志,楼下住着陈正人同志。这座房子和其他的病房差不多,但环境較安静。

“好吧。”我說。

我叫陈炳輝馬上去找了一两个人,到老古井旁,在楼下找一間房子,搬去一张木床,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把房子打扫一遍;我去見毛主席。

不知是誰,在老古井旁看見了毛主席,把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医院,整个医院都喜气洋洋,紅軍打了胜仗,医院里又来了毛主席,这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特别是那些年輕的女护士,一个个都咧开了嘴。

我正往外面走,有个女护士悄悄地跟着我,向我要求:“傅院长,老古井病房里有事就派我去,好嗎?”我看了她一眼,从她脸上看穿了她的心事。她怕我不答应,又急急地补充一句:“我一定完成任务。”我听了忍不住笑了,对她說:“好吧!有事再說吧!”

快走出医院时，又有人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我母亲在家中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连忙叫人来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证实后，听说她马上来了个总动员，叫女儿、儿媳妇、孙子、孙女一起动手，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好象毛主席要到我们家去休养一样。

这天，天气晴朗，我一走出医院，就见北山屹立在晴空下，山上的苍松、翠柏披着阳光，生气蓬勃，这山、这树，似乎也通了灵性，盛装欢迎着贵宾。我快步走到老古井旁，进了楼，知道毛主席在楼上周以栗同志的房间里，就匆匆地上了楼。

毛主席穿了一套旧灰军装，头戴八角红星帽，人很瘦，脸上现出疲劳的神色。他正在和周以栗、陈正人同志谈话。

我走上前去，说：“主席，你来了。”

毛主席见了我，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是啊！傅医生，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很好，”我说，“主席，你瘦了，身体不舒服吧？”

“还好，就是有一点疲倦。”毛主席坐到椅子上，无所谓地说。

毛主席和我们随便谈了一会，我请毛主席去楼下休息，毛主席说：“不忙休息吧，你带去看看你们的医院。”

我陪着毛主席到了医院。毛主席见了医生和护士都一一和他們亲切地握手。这一下大家都心滿意足了。

我陪着毛主席參觀了医院中的手术室、換药室、藥房和病房。毛主席見我們的医疗用具較完备，刀子、钳子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內，很滿意，說：“你們这医院的条件不錯。”

在參觀病房时，毛主席問了伤病員同志的病情，亲切地慰問了他們。

傍晚，毛主席才回到住处休息。

这天夜里，我兴奋地回到家里。一进门，見靠門的小破房里点了盞灯，里面拴了一只騾子。借着灯光，見这只騾子一身烏黑发亮的毛，耳朵竖得高高的，四只蹄子雪白，“哪里来这么一只壮实的騾子？”我正在奇怪，我姊姊来了。她說：“是陈炳輝刚才牵来的，他說这是胜利品。是林彪同志送給你的。”

我高兴极了，用手不断地摸着騾子身上的黑毛，心想：陈炳輝刚才忙得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訴我。

怎么飼养这只牲口呢？我想起了我們驢嶺有一个养馬的老乡，我要姊姊去和他商議，請他帮我飼养这只牲口，千万要把它养好。姊姊答应后就去了。

我进了屋，孩子們都沒睡，見了我，把我围住了，我母亲、愛人也都来了，問我：毛主席身体怎样？住在哪里？……她們真希望見到毛主席，我母亲說：“哪天能請

主席到我們家來玩玩就好了。”這一夜，我們一家人談到深夜才睡覺。

第二天下午，我到毛主席的住處去，給毛主席檢查身體。檢查結果，毛主席因過度疲勞，需要每天進行治療，還要較長時期的休養。

毛主席十分關心我們的醫院，我給他打了針後，他就詳細地問我們醫院中的情況，從組織機構、醫院設備、藥品的來源到醫務人員的情況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當毛主席聽到我們醫院只有六個醫生時，說：“現在環境比以前穩定些了，應該多訓練些軍醫，我們很需要醫生。”

“訓練一個醫生不容易，起碼得幾年。”我說。

“幾年太長了，一二年就夠了吧！”毛主席說。

毛主席又對我講了當前的環境和需要，我發現自己的想法錯了，我們哪里有那么長的時間呢？必須在短時間內訓練出一批紅色醫生來。

毛主席又問到陳炳輝在醫院中的工作情況，我說：“他工作一貫積極負責，是共青團員。”

毛主席很喜欢陳炳輝，又問到他學醫的經過，我說：“他原先是學刻字的學徒，幾年前有一天，我睡在北山上的草地上曬太陽，有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走近我，見我睡在地上，奇怪地看着我。我見他身上穿得很破爛，但長得很好，眼睛亮亮的，圓臉，臉上也長一對小酒窩，伶俐得很，就跟他談起話來。我問他叫什麼，他說：‘我叫陳炳輝，’

我問他是干什么的，他說：‘學刻字。’我問他家住在哪裏，家裏還有什麼人，他用手向山下一指，說：‘就住在你家的隔壁，家裏還有媽媽和妹妹。’原來我們還是鄰居，可是我還一直不知道。我和他談了很多，很喜歡他，就問他：‘你喜歡學醫嗎？’他說：‘學醫？喜歡！就是沒有錢。’我說：‘我幫助你。’就這樣，第二天，他搬到我們醫院來學起醫來了。他的學習成績很好，是同學中學得最好的一個，能吃苦，肯鑽研，也很聰明，後來就當了醫生。”

“他還是個勞動人民出身的醫生，”毛主席聽了，很有興趣地笑着說，“這次戰鬥中，他工作很負責，也有能力，你看讓他當醫務主任怎麼樣？”

我們醫院中，除了我這個院長外，下面就是醫生，沒有醫務主任，下面有什麼事都找我，而我又忙不過來，不少工作就受到了影響。現在毛主席給我出了個好主意，設個醫務主任，就能加強領導，而陳炳輝確實也能擔負這個責任。過去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呢？我很高興地對毛主席說：“好的，我們很需要有個醫務主任，陳炳輝來干也合適。”

這天，毛主席和我談了很多，特別強調要我注意培養幹部，適應革命戰爭的需要。

從毛主席的住處出來，我想了很多。這幾年，醫院里接收了很多傷病員，幹部是大大地不足。但是，工作一忙，我只顧完成當前的醫療任務，忘了培養幹部；對培養

的，這自個的「階級觀點」認為非經過幾年正規訓練不可，不敢打破常規，適應環境需要。這些都是錯誤的。今後，革命不斷發展，蘇區又沒有別的正式醫院，任務越來越重，如果單靠我們幾個醫生，勢必會影響任務的完成。毛主席的意見真是可貴極了。

不久，我們在醫院中成立了紅色醫務學校，訓練醫務工作人員。我兼任校長。

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面前透露了我母親的願望，想請毛主席到我們家去坐坐。毛主席竟答應了，他說：“好啊！我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我跑回家去告訴母親，我一家人知道了，心里都樂開了花，我母親那時已七十歲了，却變得年輕起來，親自動手，和孩子們一起擦桌子洗碗。我的小孩子維光樂得拍着手，從前屋跳到後屋，嘴里喊着：“毛主席要到我家來了！毛主席要到我家來了！”我們想請毛主席吃飯，做什麼菜呢？我母親說了一樣菜，我愛人又說了另一樣菜，我挑毛主席愛吃的菜加了幾樣。做完菜，全家人都換上了乾淨衣服，又請了幾個陪客，等着毛主席。

毛主席來了。我們在門外迎接他。毛主席一見我母親，緊走幾步，還沒等我們向毛主席問好，毛主席倒先向我母親問起好來了，說：“老太太，你很健康啊！”

我母親見毛主席這樣謙遜，這樣平易近人，一點也不

拘束了，笑着拉住毛主席的手，說：“謝謝主席，快請到里面坐吧！”

孩子們拥到毛主席身边，搶着和毛主席握手，这个說：“毛主席，你好！”那个說：“你好，毛伯伯。”維光張着兩只手，笑着跳着大声喊着：“毛伯伯，毛伯伯！”

毛主席見了孩子們，笑容滿面，彎下身子拉拉这个孩子的手，又拉拉那个孩子的手，慈愛地回答說：“你們好，小朋友！”

毛主席到了屋裡，我把家裡人向毛主席介紹了，毛主席和她們都握了手。坐下后，毛主席見我的一个孩子維康較瘦，關心地問：“为什么这么瘦？有病沒有？”

“沒有什么病，就是身体不大壯。”我母亲說。

毛主席点点头，說：“要多注意他的健康。”

在談話中，毛主席問到我們的老家，問到我過去的詳細情况。

“我們原先住在长汀县伯公岭乡，連他父亲和我家都是种地的，家里地少，那里又都是沙地，收成差，除了交租，每年都不够糊口，后来，就搬到汀州城里来了。”我母亲說。

“这么說，你們都是农民出身。”毛主席說。

“是啊！到了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呀！人地生疏，吃沒吃处，住沒住处，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事，他父亲做了搬运工人，我給人家挑水、洗衣服，才活下来。”

“傅医生，你怎么学了医呢？”毛主席又問。

“我是在福音医院里开始学医的。这个医院是英国教会开办的，他們叫我来学医，但每天得給他們挤牛奶，挤完牛奶才能去上課。”我說。

“他們叫你做工，才給你飯吃，讓你上学。”毛主席說。

“是的，他們还說是救济了我呢！”我說，“临毕业那一年，我父亲死了，家里欠了人家三百块錢，年三十，人家来逼債，我没法，想到上海去做工，幸亏有几个朋友帮助，每月貼我一些錢，我才留在汀州上完了学。后来当了医生。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时，汀州举行了示威游行，我們激于气愤，联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医生害怕了，逃回了国，群众推举我当了院长。”

毛主席听完了我的話，对我說：“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被压迫階級出身。”接着，毛主席帮我分析了历史和思想。当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但階級觉悟还不够高，毛主席諄諄教导我說：“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統治階級，我們才有出路。”毛主席短短的几句话，却帮助我加强了階級斗争的觀念，使我在革命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吃飯的时候，我們請毛主席坐上座，毛主席却請我母亲坐了上座。我母亲敬毛主席喝了一杯酒，母亲說：“保护主席一百岁，保护紅軍打胜仗。”

① 长汀土話，意即祝福。

毛主席謝了我母亲。

这一天我們一家人过得非常愉快。

毛主席对老人的尊敬,对孩子的爱护,对同志的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深深地感动了我們。过后,我們想到这一天,就好象又見到了毛主席。

因为这天我們做的菜太多了,又請了陪客,后来毛主席誠懇地对我說:“我們是同志关系,那天你留我吃飯,我吃了,但是你不必做那么多菜,也不必請什么陪客,这是战争环境,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要鋪张浪費。”当时我听了,脸刷一下紅起来,毛主席的話刺中了我的一个大缺点!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当了医生和院长后,沾染了一些非无产階級意識,生活作风是不够朴素。我真是慚愧得很。

那时,每天下午五点钟,我总是走到北山下,去找毛主席出来散步。每次去,毛主席不是在看書,就是在写东西。名义上毛主席是来这里休养,实际上他每天都紧张地工作。我想,这叫什么休养呢?我劝毛主席多休息,毛主席說:“你的意見很好。”可是他总做不到,还是照旧工作。我只好每天下午来邀他出来散步,讓毛主席得到一点休息。

北山上,树木很多,四周靜悄悄的,傍晚,除了归窝的鳥兒在天空哇哇的叫声外,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我陪着毛主席在山上山下轉，向他介紹这里的山和樹的名字，介紹野花和野草的名字，毛主席总是兴致勃勃的，問這問那，又愛深追深問，有时竟把我这个本地人問得答不上來。

毛主席也常常告訴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山上，我們看到很多松樹的樹身上挂着一條條黃色半透明的膠汁，毛主席在松樹下站住了，用手指着膠汁頗有興趣地說：“你看，這膠汁是從一塊傷痕上流出來的，樹受了傷，用自身流出來的膠汁來醫治；人也一樣，負了傷，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復健康。是不是這樣？”

我在北山上轉了十幾年，也常看到樹身上挂着這種膠汁，只知道這是樹上的分泌物，不知道它還說明了醫學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原來是這樣！”我說，“增強傷病員自身的抵抗力是很重要的，吃藥打針只能起輔助作用，所以我們總是想法使傷病員有一定的營養和充分的休息，使他們增強抵抗力。”

“這很好。”毛主席說。

我們走出樹林，又走到几座山頭前面，毛主席仰起頭，望望這個山頭，又望望那個山頭，問了山頭的名字，又觀察了山下的地形，然後健步上了一個山頭。毛主席站在山頂上有趣地問我：“要是有人打來，你當指揮員，你準備占領哪個山頭打擊敵人？”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不禁惭愧起来，我对军事很感兴趣，但不懂；我看了看几个山头，憑着我简单的常識，我想，总应该占领那个最高的山头吧，居高临下，便于打击敌人，我就說：“占领那个最高的。”

毛主席却說：“不对。”

毛主席仔細地告訴我，选择山地地形打击敌人时，山头的高低虽是打击敌人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毛主席講了很多战术上的問題，我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軍事知識非常淵博，对問題的認識又深又透，講起来，却又是那样通俗易懂。

我們就这样随便地說着走着，每天从五点钟散步到七点钟，目送着太阳下了山，才往回走。

毛主席回到住处，又开始了他的夜間的工作。

有一天，毛主席跟我談改編福音医院的問題。当时，我們这个医院，虽然自一九二七年起已經为紅軍的伤病員服务，但为了到白区購買藥品、訂閱报纸等便利起見，一直在名义上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福音医院)的名称。

毛主席說：“我們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这是个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我們把它改成中央紅色医院，你看怎么样？”

我很同意。

毛主席叫我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付主席項英同志，

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我想，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决定了就行了，何必还要到瑞金去请示呢？但毛主席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事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这事使我感到毛主席的组织观念和民主作风是多么强啊！

我到瑞金去了，组织上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正要改编福音医院、创建中央红色医院时，情况起了变化，

有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样？”

原来敌人要来打阔西了。

“我跟主席到瑞金去。”我毫不犹豫地說。

“医院呢？”毛主席问。

“搬到瑞金去。”我说。

“好啊！”毛主席很高兴，说：“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我临走时，毛主席又关心地问：“你的家怎么办？”

“也去。”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好吧！路上要小心，你母亲年纪大了。”

“你放心吧，主席。”我感激地回答。

第二天，毛主席就要走了。

我和陈炳輝，还有在医院休养的陈正人同志，把毛主席送到汀州西城門外。路上，我怀着深深的惜別的心情。毛主席在我們医院中住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我对毛主席照顧得很少，毛主席总是叫我去关心整个医院，关心全体伤病員，特别是重伤病員，不要多照顧他；而他对我的教育却是无法計算的，無論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都給了我极深的影响。我那年已經三十八岁了，在这三十八年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是誰也比不上毛主席給我的印象深。毛主席是我遇到的人中最慈愛、最博学、最伟大的人。那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几年了，但还不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以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象是黑夜见到了明灯，荒山中遇到了亲人一样，我离不开他！我觉得自己全身充滿了热力，这种热力是我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沒有产生过的，它使我相信自己終有那么一天，能站到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顆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給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鋒隊員，一个共产党员。

所以，在这四个月中，与其說毛主席是来我們医院中休养的，还不如說是毛主席来帮助我們工作的；与其說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說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毛主席真是我前进的引路人！我希望一辈子跟在

毛主席身边，一刻也不离开他。

在路上，陈正人同志和毛主席說着話，我默默地走着，望着毛主席高大的身材，慈爱的面孔，把这些印到心底深处。

到了西城門外，毛主席和我們握別，还說：“我們很快就会見面。”

“主席，希望快些派人來，我們好快些搬家。”我握住毛主席的手要求。

“好的。”毛主席說。

毛主席騎上馬走了。我們三個人，在城門外站着，一直到望不見他的身影時，才進城。

過了几天，毛主席派來了中央政府辦公廳的傅公俠同志，和我們商議搬醫院的事。

醫院里的工作人員，從醫生到護士，全都遷到瑞金去，這就解決了個大問題。傷病員中，除了痊愈的可以出院，其他也轉移到瑞金去。醫院里的東西，從儀器到藥櫃，從床鋪到桌椅，不論是原來醫院中的財產，還是我個人購買的東西，我決定全部搬走，獻給革命。傅公俠同志表示很歡迎，因為當時紅軍中還沒有一个正規的醫院，什么都很需要。

醫院決定搬到江西瑞金的楊崗下。傅公俠同志走時，我派陳炳輝同志跟他一起去打前站，安排房子，接搬轉移去的傷病員，整理搬去的東西；我留在長汀，負責搬

运前的工作。长汀和瑞金相距八十里路。傅公侠同志派来了一百七十个运输员，搬了两个星期，才把医院搬走了。

我全家人也随医院到了瑞金。正如我所料，老母亲虽然年纪大了，但很乐意搬这次家，因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瑞金。

我一到杨岗下，陈炳辉就来了，他说：“这里原先有个大地主，姓杨，我们的医院就搬在他家的祠堂里。这祠堂很大，有好几座房子。”

“哦！带我去看看。”我说。

我们走进杨家祠堂，左边有几座楼房，四周还有几座平房。楼房下的大厅作了手术室，旁边是药房，病房都分散在四周。陈炳辉把东西都安排得差不多了。

不一会，毛主席来了！这时毛主席住在离杨岗下二十里远的叶坪，知道医院搬了来，马上就来了。

我迎出去，毛主席说：“都搬来了吗？”

“都搬来了。”我说。

我请毛主席进了屋，毛主席看了手术室、药房和病房后，问我：“你家里人住在哪里？”

“在楼上。”我说。

毛主席听了，就上楼去看我母亲，亲切地说：“我们欢迎你。”

我母亲被毛主席的关心感动得一面笑，一面流着泪

說：“主席，謝謝你，謝謝你！”

下了樓，毛主席就跟我談工作，他說：“這個醫院，是我們的第一個醫院，交給你，由你當院長，你把紅色醫務學校交給賀誠同志辦，你專來辦醫院。”

“好。”我很感激毛主席對我的信任。

“我們派郭實秋同志來當政委，他是個老同志，幫助你辦醫院。”毛主席說。

“這太好了！”我很高興，我知道郭實秋同志是個老革命，他來了，就能加強我們醫院的政治領導。

談到醫院的任務，毛主席說：“除了給紅軍看病外，也要給老百姓看病。”這一點過去在長汀時毛主席也幾次強調，因為我們這所醫院，是中央蘇區唯一的醫院，過去不但紅軍中沒有正式的醫院，就是附近十幾個縣里，也沒有第二個這樣的醫院。

“這個醫院的任務很重，你要當好這個院長，首先得有一個觀點：全心全意為傷病員服務。”毛主席嚴肅而又溫和地對我說。

“我一定好好地為傷病員服務。”我向毛主席作了保證。

最後，毛主席又指示我：對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要結合進行；要教育大家講衛生。

毛主席走後，我和陳炳輝到村里去走了一趟，這裡的衛生情況較差，老百姓都喝池塘里的死水，很容易傳染疾

病，我們決定先在醫院旁挖一口井，解決飲水問題，再發動大家做好環境衛生，并向群眾作衛生宣傳。

不久，郭實秋同志來了。

中央紅色醫院，在毛主席的親自指導下正式創立了，那是一九三三年初。

這在當時是件大事。那時，很多紅軍的傷病員在農村中醫治，沒有醫療器具，沒有醫藥設備，有些地方只有燒酒，又沒有醫生，條件很差。老百姓看病也很困難。我們的醫院一成立，紅軍和附近的老百姓都很高興，說：‘我們有了自己的醫院了！’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當時還登了一篇文章，題名“紅區送給傅院長”，祝賀醫院的成立。

我們的醫院中，不但有西醫，還有中醫，第一個中醫師是從上海來的鄧穎超同志的母親鄧老太太。毛主席很重視中醫，主張中西醫結合給傷病員治療。

醫院成立後，我們就大批接收傷病員，第一批接收了八十多人。

傷員中，有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他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受了重傷，炸彈片留在腹中。負傷後住在農村中醫治，由於醫藥條件差，傷口化了膿。他被抬到我們醫院中時，情況很不好。我們找了一間安靜的獨立屋子給他住，那裏還住着周以栗同志。我們採用“保守療法”。給他排膿、去毒，又給他打針，補助營養，保護傷口。

长征后，他被安全地送到了苏联，取出了腹中的弹片，伤口就好了。

伤员中，还有红军第三军团政委蔡树藩同志。在福建沙县与敌人作战时，他的胳膊受了重伤，伤势很严重，从火线上抬到医院来时，他痛得咬着牙，不断噤噤地往里吸气。我们给他治疗了二三个月，伤好后，在长征前出了院。

有一天，一付担架抬来了红军警卫营营长方强同志，才二十多岁。他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我亲自给他检查了伤口，揭开被子一看，棉衣上渗透了鲜血，我轻轻地解开他的棉衣，衬衣沾在胸口上，鲜血从衣缝里不住地向外流。原来，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前胸，又从后背鑽出去，身上被打了个对穿洞。伤口离心脏只有几分远。当时他透不过气来，嘴里又吐血，伤势十分危险。我给他注射了止血药，又平定了他的呼吸。但是伤口怎么治呢？象这样的伤，过去我还没有治疗过。我突然想到了在汀州北山下散步时，毛主席讲的关于松树流胶汁的事，我耳边响起了几个月前毛主席说的话：“……人也一样，负了伤，有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恢复健康……”我有了办法，给方强同志的伤口消了毒，上了药和敷料，防止感染，又给他打了止血针，同时采用半卧位静养，充分增加他的营养，使他增强抵抗力，派董以湘护士昼夜照顾他。只经过了一个多月，方强同志的伤口就长好了。

对于我们医院中的伤病员同志，毛主席是非常关心

的。記得紅軍第十二軍軍長伍中豪同志患急性肺炎時，毛主席天天來看他，一來就坐在伍中豪同志對面的小鐵床上，有時摸摸他的額角，試試他的體溫，有時給他蓋好被子，就好象慈愛的母親關心自己的孩子一樣。本來肺炎是要傳染的，但偉大的階級友愛使毛主席沒顧這些。

在毛主席的教導下，我們醫院不但想盡辦法給紅軍傷病員治療，而且也一貫地盡力給老百姓看病。

那時，我白天給傷病員同志看病，晚上編講義，給紅色醫務學校的同學們講課，其他醫生和護士也很忙，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編講義，有個二十多歲叫毛煥章的老鄉提個馬燈進來了。

“傅醫生，你快去救救我老婆吧！”他一見我，急得要哭地說。

“你老婆怎么了？”我急問。

“生孩子，請了個接生婆，一天也沒生出來，血流了一床。”毛煥章說。

我馬上拿起藥箱，帶上接生用具，說聲：“走吧！”跟着他一氣跑了一里多路，到了他的家。

我進去一看，他老婆臉色刷白，嘴里不斷地呻吟着。我馬上洗了手，戴上橡皮手套，讓毛煥章點起一盞煤油燈，作了檢查。原來接生婆把產婦的子宮弄破了，因此出血不止。我給她接出了孩子，是個女孩，又白又胖，很好玩；隨即用手捏住了傷口，縫好了。大人孩子都脫了險，

全家人都很高兴。

这事至今已隔二十多年了。全国解放后，我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十二个人，好象是张全家福，上面有一对老夫妇，还有三个年轻妇女，七个小孩。原来这封信是毛焕章写来的，照片上的老夫妇，就是他和他的老婆；三个年轻妇女中，有一个抱了个小娃娃，那就是我那次接生的他们的第一个女孩子，那个小娃娃是她的孩子；其他两个年轻妇女和六个孩子是她们后来生的儿女。毛焕章至今还记着我们医院，在信上谈了很多感激我的话，说我救了他一家人。

我看了这封信，拿着信纸的手好久没有松开，我想：毛焕章啊毛焕章！你哪里知道，我虽然治好了你老婆，接下了你的女儿，但是你应该感谢的却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他决定了我们医院的性质和任务，指示我们不但要给红军看病，而且还要为老百姓看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关心着你们，关心着全国人民，他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在零都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党中央委员会驻在离瑞金三四十里的梅坑。一天，我带着医助鍾福昌同志到毛主席的住处去。

由于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当时毛主席很瘦，身体不好，組織上原想派陈炳輝同志去护理毛主席。为这事，中央总务处的袁福清处长和我，已經到毛主席那里去了一趟，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只要一个医助，袁福清同志和我还是想派个医生去，毛主席却說：‘現在部队很需要医生，我們的医生又很少，我自己怎么好用一个医生呢？’我想：虽然我們医生不多，但也有几个，調一个医生护理毛主席本是天經地义的事。毛主席最后还是沒有答应。这样，我只得在医助中东挑西挑，挑了个鍾福昌。

鍾福昌是共青团員，才十七岁，长得挺壮实，整天嘻嘻笑，脾气很好，技术也不错。当我經過反复考虑，挑中了他后，就告訴他。他听了，兴奋得脸都紅了起来。

那天，我带着他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一路上，我也为他高兴。能跟在毛主席身边，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我美

慕地看看他，見他很激動，脚步輕快而有点慌張。我一面走一面囑咐他：“到了毛主席身邊，一定要細心謹慎，好好護理毛主席，決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難隨時告訴我，我幫助你解決。”這些話，我已經在這幾天跟他說過好幾遍了，這時不知為什麼又說起來。鍾福昌嘴角上挂着笑容，一面點頭一面說：“我一定好好護理主席，隨時向你報告。”

毛主席住在村里一家老百姓的屋子里，我們一進去，見他坐在一張小桌子旁寫東西，桌上還放着一把小茶壺和幾個土碗。見我們進去，毛主席放下手里的毛筆，站起來，讓我們坐下，給我們倒了兩碗茶，又拿出戰鬥中繳獲的糖果餅乾，招待我們。

“主席，我派了一個醫助來照顧你。”我喝着茶說。

“好啊！”毛主席說。

我向毛主席介紹了鍾福昌同志的情況，說鍾福昌是江西人，在紅色醫務學校里訓練出來的，學習成績很好。毛主席听了很高興，轉向鍾福昌，親切地問他多大年紀、什么文化程度，又問他家中的情況。見他端坐着，也不喝茶，也不吃糖果，象個客人，就拿了一些糖果放到他面前，溫和地說：“不要客氣，吃一點。”鍾福昌一點也不拘束了。又談了一會，毛主席叫鍾福昌回去準備一下東西就來，我倆就走出了毛主席的住處。我對鍾福昌說：“你看主席瘦得很，以後吃飯睡覺你都要好好照顧。”第二天，鍾福昌背

上一个紅十字挂包，帶了一些必需的东西，就去护理毛主席了。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中央紅色医院里給紅軍伤病員看病，突然接到张聞天同志的電話，叫我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

我不知什么事，急急地赶到他那里，謝覺哉同志也在，我見他俩脸上現出焦急的神色。张聞天同志一見我，就說：“毛主席病了！”

“主席病了？”我驚訝地又問了一句。

“是啊！病了几天了，燒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聞天同志說。

我听了心一顫，上次去，毛主席不是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病得这么厉害？我来不及多想，說：“我馬上就去給主席看病。”

“很好！”张聞天同志和謝覺哉同志同时說。

当时毛主席已到粵都去了，离梅坑有一百八十里路。我把医院里的事情交給了陈炳輝同志，把各种急救藥品、听診器、体温表和注射器等等放进药箱，拉出林彪同志給我的那头驢子，騎上就往粵都跑。

这时虽然是初秋季节，但太阳还很毒，这几天天气又悶热，我騎在驢子上拼命地朝前赶，一刻也不敢停留。不一会，全身已淌滿了汗，衣服也湿透了，我却一点也不覺得热，心里还冷冰冰的。在路上，想到十几天前的事，我

真懊悔，当时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自己的意见，派个医生跟着毛主席；要是有了医生及时诊断治疗了，说不定毛主席的病不会拖这么多天。这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百万大軍向紅軍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敌人穷凶极恶，不但对我们进行軍事上的围困，而且在經濟上也封鎖了我们，企图搯死我们。革命正处在非常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中！我们都需要毛主席挑起领导紅軍粉碎敌人的主要担子，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可恶的病菌侵袭了毛主席。

我边跑边想，赶了二三小时的路，天色慢慢黑了，我借着月光，繼續赶路。第二天上午，我在一个小鎮上买了碗稀飯吃，又跨上騾子赶路。

跑了一天一夜，当天傍晚，我到了零都。在毛主席的住处門前，碰到了鍾福昌，我来不及跟他多說，就問：“主席在哪里？”

鍾福昌一脸愁容，往日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见到我，他高兴了，馬上带我去見毛主席。

我急匆匆地走进毛主席的房間，屋里有一张木板擱起来的床鋪，一张沒有油漆过的桌子，还有一张板凳。床上，冷天当被子盖的毯子垫在木板上当褥子，上面鋪一条白洋布单子。毛主席就躺在这张床上，額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紅，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顴骨高高地突了出来。为了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整年整月不分白天黑夜地操心，劳累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毛主席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睁开眼看到了我，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你来了！”

我走到毛主席床前，说：“主席，我来了。”

毛主席精神很疲劳，不能多说话。我不敢多问，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进毛主席的嘴里。毛主席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我焦急地等了五分钟，从毛主席的嘴里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无情的水银柱升到一百零五度（即摄氏四十一度）。我有点惊慌，极力使自己保持镇静，给毛主席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就是腹部有点胀。当时我们没有显微镜，也没有爱克司光，不能验血和透视，检查只能到这里为止。

为了正确地判断病情，检查后，我招呼钟福昌到外屋，向他了解毛主席病中的情况。

一走出屋，毛主席的文书黄祖炎、警卫员吴洁清、陈昌奉等同志都围上来，着急地问：“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热度很高。”我简单地回答了他们一句，就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钟福昌说。

“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了点米汤。”吴洁清说。

“有时候昏迷吗？”

“不昏迷，頭痛得厉害。”鍾福昌說。

究竟是什麼病呢？凭征象和自己十几年的医疗經驗，我估計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一是腸伤寒，一是恶性瘧疾。經過仔細分析，想到毛主席的胸部既然正常，虽有几声咳嗽，也不厉害，不見吐鉄锈痰，不象肺炎；腹部虽較脹，但經過灌腸后，松软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見斑点，也不象伤寒。三个可能否定了两个，我判断毛主席得了恶性瘧疾。据了解，零都这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鑽进鼻孔里，老百姓中已有人患了瘧疾，再說这时正是初秋时候，在南方是瘧疾流行的季节，毛主席的床上沒有蚊帳，可能傳染上了这种病。鍾福昌同志虽然給毛主席吃了奎宁，但葯量不够，不济事。我作了这样的判断后，准备給毛主席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吃奎宁丸。我把这意見告訴了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很熟悉医药卫生的。他同意了。我給他打了針，两小时后，又給他吃了一片零点三克的奎宁丸。

我叫鍾福昌多給毛主席喝开水，多換換額上的冷手巾，就走出了他的房間。

黃祖炎已把我的背包拿进他的房間里，房里加了一块木板，攔了个鋪，讓我和他同屋住。这时我才看了看这所房子。这是一家老百姓的住房，一連三間，左边一間是毛主席的臥室兼办公室；中間一間是个厅，警卫員同志和鍾福昌住在这里；右边一間就是黃祖炎住的。除了厅稍

大一点，两边两间都很小。我走进黄祖炎的房間，坐到鋪上。黃祖炎一边帮我解背包，一边說：“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可把我们急坏了，鍾福昌的藥又不頂事。”

我躺到鋪上，說：“沒有化驗儀器，这病是不大好判斷。”

“是瘧疾？”黃祖炎問。

“恶性瘧疾。”我說。

“这病好得快嗎？”黃祖炎又問。

“会很快好的。”我安慰他，同时也安慰着自己。

我休息了一会，心里老不放心，又起来去看毛主席。見他睡得很安穩，呼吸也很均勻。我踮着脚走了出来。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听到黃祖炎的床板老是噹噹的响，外屋厅里，也不时有人走动。我虽然赶了一天一夜路，但心里不安宁，眼一合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惊醒过来，側耳听听对面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毛主席的咳嗽声，心里就象扎上了針一样，更睡不着了，心想：不知退烧了沒有？我判断的病情不会錯吧？藥下得合适吧？脑子里一个劲地翻騰着；有时听不到什么动静，眼皮就合起来了。

第二天清早，我走到毛主席床边，見他已經醒了。我問：“主席，好一点沒有？”

毛主席轉过身来，用手摸摸額角，說：“头輕了一点。”

我拿出体温表，要給毛主席試体温，他問：“你睡得好

嗎？”

“我睡得很好。”为了使毛主席寬心，我撒了个謊，接着問：“主席睡得好嗎？”

“我睡得好。”毛主席說。

我給毛主席試过体温，一百零二度，退了点。我心里很高兴，全身都感到輕快，我的判断是对的。

“热度退了点吧？”毛主席問。

“退了点！”我兴奋地回答。

我又給毛主席检查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象昨天一样，我給毛主席打了一針，又拿出三片奎宁丸，一天分三次吃。

第三天，毛主席的体温退到一百度，額上的湿手巾拿掉了。当我問到毛主席的健康时，他說：“今天感到又好了一点。”

这天，和前两天进行了同样的治疗。吳洁清給毛主席煮了点稀飯。

我回到黃祖炎的房子，感到肩上的重担輕了，心里很舒暢。我打了个报告給党中央，报告了毛主席的病况，并建議中央和后方的同志吃一点奎宁，以預防瘧疾。

心里輕松了，睡觉也香了。第四天早晨，我还睡在床上，有个人走到我床前，温和地問我：“这几天你累了，身体怎么样？”

我睜大眼睛一看，是毛主席！他怎么起床了？我急

忙爬起来回答：“我很好，主席，你要多休息！”

“我好了。”毛主席笑着說。

我拿起药箱，随毛主席走到他房中，給他检查身体，一試体温，真是天大的喜事！水銀柱稳稳地停在九十八点四度上（即摄氏三十七度）。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全身暖洋洋的，手心里冒出了汗。我捏住这支体温表，看着里面那一管透明的水銀，它今天显得格外明亮，甚至发出閃閃的光彩，我越看越可愛，心里不知怎么产生了感激它的心情，好象它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报告了我一个最好的消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訴鍾福昌，告訴黃祖炎，告訴吳洁清、陈昌奉，还要报告党中央，讓所有关心毛主席病的同志放下心上的石头吧！

我忍不住心里的喜悦，笑着报告毛主席：“你退烧了，九十八点四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主席也笑了。

这时，我见毛主席已坐到那张沒有油漆过的桌子旁，桌上摆了文件、紙、毛笔。干什么？毛主席要开始工作了？那怎么行呢？連烧了六七天，烧得那么高，六七天只喝点米湯，昨天才开始喝了点稀飯，今天虽然退烧了，两眼已陷了下去，脸上沒有血色，又瘦又黃，走起路来都是輕飘飘的。我是一个医生，了解大病初愈的情况，就是一个鉄打的人，这时要工作，也支持不了啊！毛主席至少得休息三天！三天！但是，看来毛主席連一天、半天、一小

时都不肯休息。他已經在翻閱文件了。我一定得尽到医生的职责，劝阻他。

我走到桌旁，說：“主席，你虽然退烧了，可还得休息几天，现在就工作太早了。”

毛主席望了我一眼，象是想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严肃而又温和地对我說：“休息？做不到的，你知道环境很紧张！”

他见我脸上現出担心的神色，又安慰我說：“我好了，你放心吧！”

一提到环境，我能說什么呢？可恶的敌人連着向我們发动“围剿”，而且越来越疯狂，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种，把人民永远踩在他們的脚底下。为了击败敌人，毛主席在重病后都不肯休息。毛主席肩上挑的真是一付千斤重担啊！但是，我又想：正因为这样，他应该更加保重身体呀！他却常常只顧工作，白天工作到深夜，深夜工作到天明，第二天睡一会，接着又是开会、看文件、写文章，常常因为紧张工作，忘了吃飯、喝水，冬天忘了寒冷，夏天忘了炎热，生病的时候忘了按时吃葯。为了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火，烧毀旧中国的黑暗、腐敗，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毛主席真是操尽了心。

我見毛主席已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不便去打扰他，沒奈何，只得悄悄地退了出來。

黃祖炎見我出來，低声地問我：“怎么样，主席的病又

好了点嗎？”

他这一問，我才想到忘了把好消息告訴他們，我說：“主席退烧了。”

“真的？”

“好啊！”

“傅医生，亏得你来了，治好了主席的病，太謝謝你了！”

我的一句話把大家都引来了，吳浩清、陈昌奉等都围上来，高兴得說出各种各样感激的話。我想：治好毛主席的病是我的职责，我只是完成了一項應該完成的任务。但我見到大家的脸上現出了几天来第一次笑容，話也多了，低声地开着玩笑，甚至打鬧起来，我心里和大家一样痛快。

“主席刚好就在工作了。”我說。

大家一下又靜下来，担心起来，鍾福昌說：“前几天，主席已經病了，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主席关心别人的身体，自己总是艰苦工作，鍾福昌到这里来也改行了。”陈昌奉說。

这几天沒注意，原来鍾福昌身上背上了駁壳枪，兼做起警卫員来了。

“主席說自己身体不錯，用不着多护理他，我只得干点旁的事。”鍾福昌說。

“傅医生，你跟主席說說，請他休息几天。”吳浩清說。

“我說了，沒有用。”我說。

“你們知道，主席肩上的担子多重！”黃祖炎說。

我們想不出別的办法，只好商量好在生活上加倍注意照顧毛主席。我恐怕毛主席工作起來又忘了吃藥，從藥箱里拿出三片奎寧，叫鍾福昌一天三次，按時把藥和開水送到毛主席面前。

這天開午飯，吳浩清雙手端着一個江西出的土罐，放到我面前，說：“主席叫我給你吃的。”

“什麼？”

“雞。”

“雞！”我驚訝地說，“為什麼給我雞吃？”

當時我們生活很艱苦，不用說雞肉豬肉很少見，就是新鮮蔬菜也不常吃。

“主席說你身體不好，要我買了燉的。”

“主席有嗎？”

“沒有，主席就叫買了一隻。”

“主席吃什麼？”

“還是辣椒、酸菜。”

我心里被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了，眼睛一熱，淚珠在眼眶里轉。我過去得過肺病，身體衰弱，這些，顯然毛主席還沒有忘記。他自己重病剛好，正需要雞肉營養身體，但還是象平常一樣，吃辣椒和酸菜，却買了一隻雞給我吃。我怎麼能吃這隻雞呢？

“吳浩清，我不吃，你端去給主席吃。”

“主席交代了，一定要你吃。”吳浩清為難地說。

他把土罐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走了。我看看土罐里的燉雞，滿滿一罐，雞湯上面浮了一層黃黃的油，雞是好雞，但這時要我開口吃，真是困難極了。想想毛主席，他總是這樣關心同志。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叫我去給何叔衡同志看病，當時我們繳獲了敵人的一个馬達，一到晚上馬達隆隆地响，毛主席知道我有失眠症，怕馬達聲音吵我，特地在很远的地方給我找了一間房子，讓我住下。這事深深地感動了我，至今還忘不了。現在毛主席又買雞給我吃。我想啊想的，忽然想到：這恐怕不只是毛主席對我的關心，也是毛主席對我的獎勵吧！是啊！當我們在工作中做出一点点成績時，毛主席常常就給我們很大的鼓勵。記得一九三三年，毛主席住在瑞金，有一天夜里發燒了，但第二天要去開一個重要的會議，當晚他把我叫去，對我說：“明天我要去做個報告，你能給我退燒嗎？”我馬上給他檢查了身體，開了藥給他吃。睡了一夜，毛主席退燒了。後來他竟對張聞天等同志半开玩笑地說：“叫傅醫生看病，可以對他下命令，叫退燒就退燒。”

我越想越多，面前的雞怎麼辦呢？

這時毛主席來了，我連忙站起來，說：“主席，我身體很好……”

毛主席猜到我要說什麼，笑着說：“你吃吧！你吃！”

說着就走了。

我只好坐下來吃鷄。滿滿一大罐，我一個人怎能吃下去呢？我邀黃祖炎、吳洁清等一起來吃，他們一個也不肯來，躲得遠遠的，我只好一個人吃。這只鷄，我一連吃了三天，九頓，才把它報銷了。

這以後，我每天給毛主席檢查一次身體，試一次體溫，都穩定在九十八點四度。為了防止毛主席重患這種病，我還是每天給他打一針，吃三片奎寧丸。

從第四天起，毛主席就恢復了夜以繼日的工作。

我在毛主席的身邊住了十天，見他的病痊癒了，飲食也正常了，每頓能吃兩碗飯，就準備回醫院去。走以前，我走進他的房裡，說：“主席，你病好了，今天我想回醫院去了。”

毛主席放下手裡的工作，對我說：“你不要走吧，我們買條魚吃吃，過幾天一起回去，我也要到梅坑去。”

我知道，毛主席買魚又是為了款待我，我怎麼能再給毛主席增加麻煩呢！因此，當天就離開了零都。

不久，我們就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在零都這十天，是我一生中永遠難忘的十天。

长征中的雪里送炭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的一天，我到张闻天同志那里去，他对我说：“我们要走了。”

“到哪里去？”我着急地问。

“敌人发了疯，想把我們困死在江西，党中央已决定紅軍主力突围西进，只留一部分同志在后方，准备打游击。”张闻天同志看看我，说：“你怎么样？”

“我跟你們一路走。”我说，“党中央和紅軍主力需要医务人员，再说，毛主席在零都大病初愈，不放心啊！”

“我們欢迎你，”张闻天同志高兴地说，“但是这件事需要經過中央討論决定，明天答复你吧！”随后，他又关心地问我：“你身体吃得消嗎？”

“沒有問題！”我很自然地回答。

第二天，我接到了张闻天同志的电话，他说：“中央同意了，你准备吧！”

我非常高兴。我知道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行动，西进到哪里？要走多久？能不能再回到瑞金来？都不能确定，就作了远离的准备，把老母亲送回了汀州，因为那里

有老家，家里的其他人决定留在瑞金。又买了八个洋铁箱子，准备行动时装上药品和医疗用具。

十月十日那天，邓发同志打电话来，说中央局有个同志牙痛，叫我去看看。我本来是内科医生，但那时医生少，外科、眼科、小儿科、牙科什么病都看，有时还给女同志接生。我接到电话后，带了一付牙钳和一些药品就走了。到了中央局，同志们正在听一个重要报告。散会后，我给那个同志看了牙。这时中央局里的同志来来往往，都在紧张地整理东西。我正在猜疑，邓发同志对我说：“马上就要西进，你赶快作准备。”

中央局离我们医院有好几里路，我来不及回去了，急忙打了个电话给陈炳辉同志。陈炳辉是医院里的医务主任，一年前又和我女儿结了婚。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马上就要随部队出发，请他给我把内外科各种急救药品和其他必需的药品、手术器具、注射器等等分装在洋铁药箱中，立即送来。又叫他跟我家里人讲一下，我来不及回家了。

过了两小时左右，陈炳辉把八个药箱都送来了，除了药品和医疗用具外，还装进了几本重要的医学书。他又给我带来了一条毯子、一条被子、几件衣服、一口袋漱口用具、手巾和一个行军壶等。两年前，他跟随毛主席打过漳州，有了些行军的经验，所以想得这么周到。

我的小儿子维光也跟着来了。我摸摸他柔软的头

发，故意地問他：“你来干什么？”

“送爸爸去打仗。”維光眨巴眨巴眼睛，稚声稚气地說。

一句話說得我和陈炳輝都笑了。

“爸爸只会打針，还没有学会打仗呢！好吧，以后再学打仗！”我說，“爸爸走了，你在家里听媽媽的話，还要知道爱弟弟。”

維光点点头。

我把医院里的工作简单扼要地向陈炳輝作了交代，要他好好为后方同志看病。陈炳輝仔細地听着我的話，說：“傅院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尽力做到。”

我又把家托給他照顧。

傍晚，大队人馬出发了。党中央和苏維埃中央政府一部分同志編在一起，代号是“紅章”部队。这时战斗部队早已出发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但当时我們并不叫它长征，也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遙远的路程。

这天，梅坑村里的几条小路上，挤滿了人，队伍在中間走，路两旁站滿了送行的老百姓，有的給部队送茶水，有的搶着帮部队挑担子、背背包，有些妇女和老太太走进队伍里，往同志們怀里塞吃的东西，嘴里还喊着：“同志們，你們可千万要回来啊！”說着說着，眼泪扑簌簌地直往

下掉。她們舍不得紅軍走啊！

在路上，我看見了在医院休养的周以栗、陈正人同志，他們也來送行，我招手和他們告別。陈炳輝带着維光，一直跟着部隊送了我一里多路。

沿途，敵人采用碉堡政策，筑了几万个碉堡，配备了机枪、步槍，用密集的火力封鎖我們的道路，同时敵机又在空中紧紧地盯住我們，又是轟炸又是掃射，非常疯狂。但是敵人是挡不住我們紅軍前进的。部隊出了瑞金后，一面战斗一面行軍，不久就西渡信丰河，突过贛州、南雄，冲破了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綫。接着又猛扑湘、粵边的汝城、城口，占領了宜章城，通过粵汉路，連着突破了敵人的第二、第三道封鎖綫。

这时候，部隊的行动十分紧张，常常在战斗間隙也得不到休息，連着急行軍，赶过封鎖綫。行軍中，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自从出了江西境后，我还没有見到过毛主席呢！不知道毛主席在这样紧张的战斗和行軍中身体可好，瘧疾复发过沒有。想到这些，很不放心，总想到达宿营地后去看看毛主席。但是一到宿营地，大家住得很分散，毛主席又忙着策划部隊行动，不好去打扰他。又一想，要是毛主席身体不好，一定会派人来找我的，沒有派人来，毛主席的身体一定很好。这样一想，又放心了。

有一夜，連續走了一百多里路，天蒙蒙亮，大家都很疲勞，照例在这种时候，队伍里最沉寂了，平日連最愛說

笑話的战士，这时也累得张不开嘴了，一心希望前面最近的一座村庄就是宿营地，可是这天却不是这样。我騎着馬向前走，一路上見队伍里有說有笑，活跃得很，还不时听到战士們說着两句話：

“喂，你看到沒有？”

“看到了，哈哈！”

看到什么了？我心里很奇怪。一路跟着我的警卫員同志也奇怪起来，他忍不住問一个战士：

“同志，你們看到什么了？”

那个战士看了我們一眼，笑着向前面指指，低低地說：

“毛主席！”

“毛主席在前面？”我立即紧了紧繩，向前面趕去。

不一会，就望見了毛主席高大的身材，他步行着，一匹馬馱着行李和文件箱子跟在后面。毛主席一面走，一面向队伍里的几个战士問着什么，那几个战士笑着回答毛主席。毛主席又看看他們的背包，試試重量，滿意地点点头。

我下了馬，向前面走去。

这时，有位指揮員向毛主席报告着什么，就見毛主席向战士們招了招手，和那位同志一面說着話，一面健步往前面去了。

我看見毛主席精神很好，放心了。

十一月中，紅軍渡過了湘江，沖破了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綫。

部隊越往西走，敵人的飛機越瘋狂，整天在頭上嗡嗡叫，就象夏天的蚊子一樣。行軍的時候，我們的頭上和馬身上都用樹枝樹葉偽裝起來，遠遠望去，綠茸茸的，隊伍成了一排活動的樹行。有一天，一頭白驢子沒有偽裝好，暴露了目標，敵機就來濫炸，身前身後掀起無數煙柱，幾個同志負傷了，驢子也給炸死了。我們馬上進行急救，給負傷的同志包紮好了，又繼續前進。從此，我們就很少帶白色的牲口了。我這是第一次隨軍行動，開頭見到敵機，心就發慌，但是一路上遇到的敵機多了，又學到了隱蔽的經驗，慢慢地就無所謂了。

為了躲避敵機，我們常常日宿夜行，到達宿營地時，大多是黎明時候。這時我們就背上藥箱給同志們看病，因為是長途行軍，很多同志的腳走壞了；又因為常常挨餓，經常吃冷飯，有些同志肚子吃壞了，我們醫務人員就利用休息的時間，給他們治療。看完了病，再回住地吃飯、睡覺。

一天下午，部隊走在一條狹窄的山路上，這條路只有二尺多寬，一邊靠山，一邊臨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條大河，河面很寬，水流也很急，老遠就聽到河水嘩嘩地流。走近河邊，見河堤足有三四丈高。我騎着馬走在這條路上，眼睛往河裡一看，就好象站在高樓頂上往下看了

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

部队人多，又有担架、牲口、行李担，路又窄，不免有些拥挤。我拉住缰绳，想尽快地让马走过这条窄路，好让后面的同志走。谁知这一带泥土松，马一失脚，立刻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只觉眼前象打了个闪电一样，嘩地一亮，随后就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只见自己躺在河边上，旁边聚了一大堆人，都提心吊胆地看着我，警卫员喊着：“好了！好了！醒过来了！”

一路和我同行的周兴、张然和等同志，也蹲在我身边，急问：“傅医生，你觉得怎么样？哪儿不好受？”

我坐起来，头有点昏，镇静了一下，哦！原来我掉到河里去了。看看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帽子也给水冲走了，头发上直滴水。见到自己这付狼狽象，我不禁笑起来，又想到我这一下子不要紧，可耽误了大家的行动，连忙站起来，说：“没什么，走吧！”

张然和同志还不放心，说：“行吗？找付担架给你坐吧！”

“不用，没伤骨头没伤肉，能走。”我说。

警卫员扶着我爬上了河堤，我们就跟着队伍继续前进。

我想起了那匹马，问警卫员，他说：“冲走了。你看这水多急！你幸亏掉在河边上，水浅，没给冲走。真把我吓

坏了，我現在心还跳呢！”

我听了警卫員的話，笑了，說：“革命嘛，还能不碰到点危险！我現在都好了，你还心跳什么？”

警卫員不好意思地笑笑，說：“誰知道呢！”

我这匹馬还是刘英同志在途中送給我的，它帶着我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帮助我減輕了长途行軍的疲劳，現在却被淹死了！馬上还放着我的毯子和被子！这下可糟了，这么冷的天，夜里沒有盖的，怎么办呢？

我穿着湿衣服，經冷风一吹，不免打顫，就加快了脚步，心想走快点可以使身上暖和。誰知一走快，肚里“咚咚”直响，原来我掉在河里还喝了水呢！真有点危险。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問警卫員：“誰把我救起来的？”

警卫員想了想，眼睛望着別处，說：“大家唄！同志們一見你掉下了河，好几个人都不顧死活地跑下河堤，下水把你抱起来了。有两个同志过去都不認識，象是連队的战士。”

听了他的話，我真感激这些救我的同志。我看看警卫員，他的衣服也湿了。

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宿营地。

警卫員忙着給我找了点柴火来，帮我烤衣服。一坐下来，我感到头頂上一陣热辣辣地痛，用手一摸，粘糊糊的，几个指头上沾了血，警卫員見了，叫起来：“唷！你負伤了！”

“別大驚小怪！不要緊。來，你給我上點藥，包紮一下吧！”我從藥箱里拿出藥和繃帶。

警衛員正在給我包紮，張聞天同志來了，他臉上的塵土厚厚的，看來到了宿營地還沒休息，就來看我來了。我連忙站起來。

“快坐下，快坐下！”張聞天同志說，“頭跌破了？身上怎麼樣？”

“就是頭上破了一點，別的地方都很好，沒有問題。”我說。

我剛請張聞天同志坐下，毛主席的警衛員來了，他手裡抱一條被子，見到我，說：“傅醫生，你跌壞了沒有？主席知道你掉到河裡了，派我來看你。”

毛主席怎麼知道了？還派人來看我！我心里一陣熱，急說：“就是頭上跌破了點皮，身體很好，你請主席放心吧！”

他把手裡的被子放到板凳上，說：“這是主席叫我送來的。”

被子？送給我？這怎麼行呢！長征途中，誰帶的東西都很少，毛主席的行李也不多，這是我親眼見到的。就是那一天，毛主席在前面走，警衛員牽了一匹馬跟在後面，馬背上馱着他的行李和文件箱，我看到毛主席只有一條被子、一條毯子，現在他把被子給了我，就只有一條毯子了。這樣的大冬天，宿營地又都是偏僻的冷房子，夜裡

只有一条毯子，怎么能御寒呢？我不能接受这条被子。

“主席給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还客气什么！过两点鐘又要出发了。”张聞天同志說。

毛主席的警卫員走了，我請他代謝毛主席的关怀。

张聞天同志叫我抓紧时间好好休息，說完也走了。

警卫員給我搭了个鋪，要我躺着休息一会。

我躺到鋪上，盖上了这条被子。这是一条白布被子，被面和被里都是用一种布做成的。我把两手伸在被子外面，手一触到柔軟的被面，就不自觉地撫摸了几下，一时有股暖气从手上直穿到全身，混身都暖呼呼的。这是毛主席每天盖的被子啊！現在却盖在我的身上。想想自己，只不过是普通的医生、一个革命队伍里的新战士，却得到了伟大革命領袖如此深厚的关怀！

自从长征以来，毛主席肩負着巨大的任务，帶領十几万紅軍和百万凶恶的敌人战斗。一路上，不管敌人的碉堡政策多么残酷，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紅軍以少胜多，消灭了无数敌人，打开了一条敌人認為无法打开的道路，終於突破重围，来到了湖南，使这一支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毛主席操着多大的心啊！就是在这样繁忙、紧张的时候，毛主席却还象慈母一样时时刻刻关心着同志們，照顧着同志們。长征以来，一路上多少同志受到过毛主席的撫爱，这是无法計算的。部队在江西打古陂、新田时，有些同志負了伤，被担架抬下来，毛主席見了，走到

担架旁，輕声地問：“同志，你的伤重嗎？”一面把伤员肩旁松开的被子盖严，伤员都感动得流了泪。組織上为了照顧毛主席，給他配备了一付担架，但是我却从沒見他坐过，毛主席不是把担架讓給有病的同志坐，就是讓給体弱的同志坐。他呢，常常走路，連馬也不常騎。

这顆伟大的心是多么慈爱啊！

我越想心里越暖，就好象太阳晒在我身上一样。

躺了一会，全身都有劲了。我起来整理药箱，准备出发。警卫員打来了飯，还是很好吃的大米飯呢！这在长征中是很难吃到的。湖南产大米，我們紅軍一路上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了地主的粮庫，把大部分粮食分給工人和农民，一部分当作紅軍的食粮。

我吃了飯，打好綁腿，紧紧鞋带，今夜沒有馬了，要走路，一切更要准备得周到些。

“你刚跌了一大跤，今天夜里又沒有牲口騎，怎么行？”警卫員发愁地对我說。

“沒有牲口就走路，很多人不是都沒有牲口嗎？”我說。

“你身体不好，听人說，你得过很厉害的肺病，又有胃病、头痛病，不能和大家比。”警卫員好象給我开诊断書一样，說了一大堆病名。

“不要紧的，你放心吧！”我笑着說。

不一会，部队就出发了。

过了几天，有个挂驳壳枪的同志，象是哪位負責同志的警卫員，走到我們住房的門口，問：

“傅医生是住在这里嗎？”

“是啊！找我什么事？”我連忙走出去，心想可能是哪位同志有病了，叫我去看病吧。

“蔡暢同志要我把这头騾子送给你。”那位同志把身旁的一头黄騾子往前牵了牵。

“太好了，給我吧！”我的警卫員一下从屋里跳出来，从那位同志手里接过了繩繩。

我又一次为同志們的关心受到极深的感动。

我骑着騾子，带着毛主席給我的被子，随着部队繼續前进。一路走，一路想；在我們革命队伍里，真是处处充滿了伟大的階級友爱啊！越是在艰苦的环境里，越使人感到这种友爱的深厚和温暖。

我的入党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随部队长征到川北下打鼓，这一带尽是高山，山上空气稀薄，人往山上爬，越爬越喘不过气来，头发胀，全身软绵绵的；上山前淌了几条河，脚又肿起老高，走起来很费劲。

在一座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女同志，她双手捧着肚子，痛得直哼哼，原来她要生产了！山上一点遮盖也没有，怎么能在这里生产呢！我扶着她往山下走，想找一间房子，给她接生。可是走了十几里路，除了山还是山，连房子的影子也见不到。她痛得走不了，把全身的重量都靠在我身上。我身上也没有力气，累得满脸通红，额上黄豆大的汗珠直冒，全身似乎都麻木了，只是机械地移动着腿。我想，不管怎么样，决不能把一个同志丢下。我本想安慰她几句，要她再忍一忍，说不定前面会有村子，可是山上不宜开口，开了口消耗了体力更走不动了，我就做着手势，指指前面，扶着她又走了几里路。下了山，才见到了一个牛栏。就在牛栏里，我给她接了生。孩子生下后，我想，产妇应该吃点东西啊！可是牛栏里除了有些乱草

外，別的什麼也沒有。我摸摸身上的干糧袋，還有一些青稞粉呢！我馬上倒出了一碗，用一只臉盆煮給她吃了。在牛欄里我守了她三天。第四天找到了部隊，用一付担架把她和孩子抬走了。

回到部隊不久，我被調到總司令部去了，因此暫時離開了毛主席。

總司令部在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領導下，沒有繼續北上，卻從川北南下了。到一九三六年，中間又反復過了兩次雪山草地，到達了甘肅。這時，毛主席所領導的部隊，早已到達了陝北。

一年多沒有見到毛主席，惦記得很。到了河蓮灣，知道毛主席住在陝北保安县，我馬上寫了封信，托蔡暢同志轉寄給主席，向他問好，又報告了路上的情況。

十月間，毛主席派彭德懷同志來接朱總司令。總司令部往保安出發了。這次行軍，我心里特別高興，因為我想不久就可以見到毛主席了！

保安是個小縣城，在過雪山草地後，這可是我們所經過的第一個大地方了。城內的街道雖窄，卻是用石子鋪起來的，剛翻過高山峻嶺，現在走在这石子路上，比走柏油馬路還覺得平坦。城內熱鬧得很，先到的同志們都來迎接我們，街上還搭起了牌坊，街兩旁的牆上貼了紅紅綠綠的標語。我象進了大城市，又想看這，又想看那，兩只眼睛都不够用了。

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臉，那是鍾福昌！我正要喊他，可是一晃他就過去了。我趕緊擠過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他回頭見到了我，一下就抱住了我，又驚又喜地大喊起來：“哎呀！是你，傅院長，你來了！”

經過長征，同志們又見了面，就象是隔了一世又重逢一樣，真是難得啊！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連連點頭。我細細地端詳他：長高了，臉瘦了，黑了，身上已穿上了棉衣，還是掛着槍，又當起警衛員來了。

“傅院長，長征中，我們常想，你身體那麼壞，能走過來嗎？”鍾福昌直爽地笑着說。

“走過來了！走過來了！”我握住他的手說，“你怎麼樣？病過沒有？”

“我很好！”鍾福昌挺了挺胸脯說。

“走，帶我去看主席。”我拉着他往前走。

鍾福昌帶我穿過了街道，走到一座山腳下，那裏有幾個窑洞。鍾福昌指着一個窑洞說：“主席就住在這裏。”

我快步走進窑洞，裏面光綫不大好，是個石窑洞，只有一個窗戶。毛主席穿一身舊棉衣，正坐在一張黑漆漆的舊桌子旁，低頭寫東西，聽到我的腳步聲，抬起頭，一見到我，放下手裏的筆站起來，走過來握住我的手，無限親切地說：“你還活着！好！”

我激動得雙手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很久沒有放下，連連地回答：“主席，我活着，活着！”

“坐吧。”毛主席移过一张板凳。

我坐在板凳上，两眼紧紧地盯着毛主席，见他精神很好，脸色黑黑的，我心里很高兴，问道：“主席路上身体可好？”

“我很好。”毛主席笑着說。

“瘧疾复发过沒有？”我又問。

“沒有，什么病也沒有生过。”毛主席一面回答，一面在桌上提起一把銅茶壺，往一个土碗里倒了杯开水，递給我，我双手接过来，喝了一口。

“你身体怎么样？”毛主席的眼睛里含着深切的关怀，望着我說，“我很担心你啊！”

听了毛主席的話，我深深地感动着，說：“我还好。”

“你的信，我收到了。”毛主席又說。

接着，毛主席又問了路上的一些情况。这时，已到了开晚飯的时候。毛主席留我吃晚飯，我也沒有客气。他还特地叫警卫員給我煮了面条。吃过晚飯，毛主席見我身上还没有穿上棉衣，叫黃祖炎同志給我去領。

第二天，我就穿上了新棉衣。

不久，“双十二”事变爆发了。当我听到张学良趁着国民党反动头子蔣介石等在西安开軍事會議的机会，把他們拘留起来的消息以后，高兴极了，我想：张学良干得真痛快！杀了这些反动头子，革命就好办多了。一天，毛主

席在紅軍大學門口的草坪上給我們作報告。毛主席說，應該釋放蔣介石。我一聽，真奇怪極了，好容易抓住了他，為什麼要放他呢？我細細地聽毛主席分析了當時國內外情況，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團結國內一切力量，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又說殺死一個蔣介石沒有用，會出來第二、第三個蔣介石的。聽了毛主席的報告後，我才恍然大悟，我原先的想法多麼簡單啊！

那天，我到毛主席那裏去，毛主席突然和我談到我的家，他說：“你兩年多沒有和家通信了，不知家裡情況怎樣？”

“在長征途中，我聽人說，敵人在通緝我。他們是在敵人的報紙上看到的消息，實際情況怎麼樣，還不知道。”我說。

毛主席想了想說：“你寫封信回家吧！”

“能通信？”我奇怪地問，因為當時我們同外地的郵寄已經斷絕了。

“周恩來同志最近要到西安去，托他帶到西安去寄。”毛主席給我想着辦法，又說：“還可以寄點錢去，不要多寄，先寄一點試試。”

毛主席想得多麼周到啊！家裡的事，這兩年來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過，有時也想寫封信回去問問，但又想，環境這樣緊張，信根本寄不到，也就算了。誰知毛主席却

給我想出了好办法，还要寄錢帮助我家。

这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交給毛主席，毛主席轉交給了周副主席^①。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們从保安轉移到延安。我收到了家中的回信，滿紙是不幸的消息：我母亲死了，陈炳輝和我的大女兒維蓮（陈的妻）也牺牲了！家中的房子被敌人拆掉了。三个孩子跟他們的媽媽住在汀州，就靠她当小学教員的一点薪水过活，生活相当困难。想不到离家仅两年多，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敌人真是残酷啊！

我把家中的情况告訴了毛主席。

毛主席很惋惜地說：“陈炳輝也死了！”

“是啊！”我一想到陈炳輝——这是个多么好的青年人啊！心里非常难受。

“你母亲怎么死的？”毛主席又关心地問。

“国民党炮击汀州，母亲年紀大了，吓死的。”我說。

“維蓮呢？”

“信上沒有說。”

毛主席在窑洞里来回走了几步，象是在回忆什么。过了一会，站在我前面說：“你家中生活很困难了，每月寄点錢去。”

“不好增加組織負擔。”我說。

^①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副主席。

“这没有什么。”毛主席說，“这里往外汇錢不方便，这样吧：三个月寄一次，一年寄四次，你看怎样？”

我感激还来不及，还会有什么意見呢！

毛主席走到桌子旁，坐下来，提起毛笔，写了一封信給中央組織部，請他們每三个月給我家補貼一点錢。我当时真是又慚愧又感激。

从此，組織上定期給我家寄錢，一直寄了十几年，直到北京解放时，家中有政府補貼了，才不寄。

在延安，我負責对毛主席的保健，天天去看他。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下午，我走进毛主席的窑洞，他正在写东西（那些日子，毛主席正忙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我每次去，他差不多都在提笔写东西，这天，也不例外）。我一进去，他就放下了手里的笔。

“主席今天还好嗎？”我走到他桌旁，問。

“很好。”毛主席站起来說，“你坐下。”

毛主席象有什么事要对我說。

我在一张凳子上坐下后，毛主席对我說：“局势很紧张啊！蔣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估計日本帝国主义很快要占領武汉，威胁西安。你准备一下，到西安去买一批，药回来。”

“好啊！”我說。

我詢問了一些情况，毛主席作了具体指示。这时，毛

主席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对我說：“傅連璋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我兴奋得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是我十几年来昼夜期望的一件事啊！特别是遇到了毛主席以后，这个念头象一粒种子落到我心底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任何风暴都动摇不了，但是由于旧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自己又努力不够，缺点很多，所以我还没有跨进党的行列中去，但是我的这个志願始終沒有熄灭，我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那么一天，党会把我吸收进它的行列中去的。我耐心地等待着党对我任何严峻的考驗。在这十几年中，党一直关心地培养着我，我虽然不是一个党员，但在江西时，医院里的很多支部活动，郭实秋同志都吸收我参加，讓我受到教育。党中央召开的一些党内的报告会，也讓我去听。长征途中也是这样，組織上吸收我参加了很多支部活动。毛主席更是长期諄諄地教导我，时刻关心我的进步。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我也常常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总是这样想：既然已經了解到共产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我就要終身从事这个事业，把全部力量献給这个事业，这样，才算白白地活了一生。但是十几年来，我一直只是在心里想，沒有把这个要求提出来。誰知道今天毛主席說出了这样一句万分珍貴的話！

毛主席又看看我，无限关怀地对我說：“現在沒有什麼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証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談談。”

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我激动得眼眶热热地，一时呆呆地望着毛主席，心里沸騰着，隔了一会，才哽哽地說：“我就去。”

我走出毛主席的窑洞，就沿着西山边到陈云同志住处去。陈云同志是当时的中央組織部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一。这天正是一个晴天，初夏的天空蓝得耀眼，西山上綠茸茸的，还开着各种野花，包着羊肚子手巾的老乡，手里拿着羊鞭，正在赶着一群群的白羊，在山上放牧，有的还唱着悅耳的陝北民歌。清清的延河蜿蜒在路的一边，凉风吹来，河水蕩漾起层层微波，吹乱了映在水中的宝塔的倒影。延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我永远忘不了你，永远，永远！我心情舒暢地看着景色，一面跨着輕快的步子往前走。

陈云同志住在西山山坡上的一座独立窑洞里。我走进去，他也在埋头写东西。我說：“陈云同志，我来找你談談我的入党問題。”

“好啊！”陈云同志笑容滿面地說。

我向他提出入党要求，并把我的历史、家庭、思想情况，統統跟他談了一遍，特別談了我的信教問題。大革命以前，我是基督教徒，但是实际上我并不信教，我小时候，父亲在汀州做工，到教堂里去听英国牧师传教，后来

英国牧师要我到他們办的福音医院中去学医，父亲为了使我得到学习机会，也为了有碗飯吃，帶着我母亲和我入了基督教。这事过去在汀州时我曾跟毛主席談过，他知道我們信教是为了吃飯。陈云同志耐心地听着我的話，有时点点头，有时又提出一些問題問我。

我講完后，陈云同志說：“你入党沒有問題，現在你先到我們党的干部訓練班中去听一个时期課，好不好？”

“太好了！什么时候去？”我說。

“明天就去吧！”陈云同志說，“訓練班就在这山脚下的城隍庙里，你早去晚归，在那里吃午飯；一面听課，一面帮同学們看病。”

“好的，我明天就去。”我站起来說。

“有什么問題，可以經常来找我談。”陈云同志十分亲切地对我說。

第二天开始，我就到城隍庙去听党課。当时参加学习的同学有些是地委一級的干部。課程有党的建設、政治經济学等。由李富春、王鶴寿、徐冰等同志輪流报告。听了报告，有些問題我还不清楚时，就去問陈云同志。每次，陈云同志都耐心地告訴我，給了我很多帮助。有时，他还留我吃飯，一面吃飯；一面还跟我談。

七月，陈云同志对我說：“你赶快到西安去买药，最好再請几个医生来这里工作，不管哪一科的都行；回来再听課。”

陈云同志的話提醒了我。一两个月来，我一心想着入党的事，竟把买药的事放在脑后了。看我这个人！

第二天，我就坐了一輛卡車到西安去了。从延安到西安，本来只要走一天多，可是这輛卡車，只能頂牛車用。第一天走了三十里路，就走不动了，修了好久。第二天也是这样。这时天气热得不行，我心里又急，每天汗流浹背。半路上，有时走到野外，天黑了，車又坏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的房子，只能露营在野外。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共走了四天，才到了西安。

我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住下了。办事处主任是林伯渠同志，我把任务和他談了，他就帮助我买了几十箱药。可是找不到医生。当时西安的很多医生都参加了紅十字会，而且都編了队，不能走。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牙医生梁智，他答应到延安去。过了几天，我正准备回延安，陈云同志打来了电报，說吳玉章同志从法国回到了西安，得了病，要我帮他把病治好，再和他一路回延安。这样，我在西安又住了一些日子。

八月底，我和吳玉章同志一起回到了延安。不久，梁智也来了。

我先到陈云同志处作了彙报，又去看了毛主席。后来又繼續在訓練班听課。

九月七日^①的早晨，我一到城隍庙，訓練班的王德主任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他从抽屜里拿出一张用粗紙

印成的入黨志願書，笑着說：“你可以填表了。”

我雙手接過了表，細心地看了一遍，按捺住內心的激動，坐下來開始填表。王德同志怕我不知道怎麼填，站在我身邊指點我。我把十幾年來的願望和一片真心填在表上。填到證明人一欄，我想，最了解我的是毛主席，我問王德同志：“證明人可以寫毛主席嗎？”

“當然可以。”王德同志說。

我在這一欄里工工整整地寫上了“毛澤東”三個字。另一個證明人，我寫了陳雲同志。

我把表填好後，交給了王德同志。

一下課，我就跑到毛主席那裏去，告訴毛主席：“今天我填表了。”

“好啊！”毛主席也為我高興。

“證明人我寫了你。”我說。

“好！你的歷史是我最清楚。”毛主席說。

毛主席又教導我，要我在入黨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奮鬥。我把毛主席的話印在心裡。

過了幾天，我被通過和批准入黨了。訓練班的同學們都來祝賀我，一會兒這個來和我握手，一會兒那個來和我握手。進了課堂，很多同學都望着我，有的對我笑笑，有的向我點點頭。我是十分興奮。

① 我是九月七日填表入黨的，但因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後來都寫了十一月七日。

第二天，我又把填表的事告訴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也很高興。這幾個月來，陳雲同志為了幫助我入黨，費了很多心思，他那深切地關心人的作風，使我很感動。我感謝了他，他却說幫助同志這是應該的。他又跟我談了很多，特別要我入黨後注意團結，陳雲同志說：“黨員最主要的一個任務是團結廣大群眾，一起前進，搞好革命工作。”

我終於在毛主席的教導下，實現了自己的政治願望，成了一個共產黨員！從一個舊知識分子到一個共產黨員，中間有着相當長的距離，而要走完這段路程，單靠我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是黨和毛主席，象母親引導孩子一樣，一步一步地引導着我，給我力量，使我終於走完了這段漫長的路程，跨進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行列。

這些日子，成了我最幸福的日子。我獲得了最寶貴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經四十四歲了，就好象重新獲得了青春一樣，全身充滿了年輕人的熱情和興趣。我感到，跟着黨走，活到一百歲也是青年，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年紀大。在我的面前，擺開了一條廣闊的光明大道，目標就是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我要朝着這個目標，一年復一年地向前跑，永遠不停止。作為一個黨員，我認為應該這樣。同時我也感到入黨後肩上的任務更重了，而自己身上還有不少缺點，必須不斷地提高自己，才能完成黨交給的任務。這是光榮的責任！我默默地起着誓：“黨、毛主席，我決不會辜負你們的教育和期望！”

革命的青春

一九三〇年夏天，天很热。夜里，陈炳辉从医院回来，洗了个澡，告诉我：“今天下午，从乡下抬来个学生，给民团开枪打伤了腿，伤口已经化脓了。我给他换药，他痛得头上直冒汗，可一声没喊，真能忍痛。”

“民团又开枪打人了！”我正在灯下清点报纸，给毛委员^①写信，听了陈炳辉的话，放下手里的笔，说，“他是哪里来的？”

“曹坊的，他父亲是个地主，今天也来了，大热天还穿件长褂，见了人打恭作揖，讨厌得很。”陈炳辉说，“这个学生看来也不喜欢他父亲。老头子临走时对他嘱咐这嘱咐那，还要他省着花钱，这个学生没好气地说：‘知道了，你走吧！’”

“伤口厉害吗？”

“小腿上一个对穿洞。”

① 就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他任红军政治委员，我们称他毛委员。到一九三一年，他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就改称毛主席。

“住在哪个病房？”

“大病房，和紅軍伤病員住在一起。”

第二天上午，我給病人看过門診后，走进大病房，挨着床位看了几个紅軍伤員的伤口，就见到了这个学生。他很年輕，約摸有二十来岁，长一头烏黑的头发，一对亮亮的眼睛，高鼻梁，方脸，脸色虽然有点蒼白，但精神还好。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紅軍战士講什么，脸上还挂着笑容。我輕輕地走过去，那个战士见到了我，对他說：“这是傅院长，你还没见过吧？”

“沒见过。”他看看我，笑着想支起上身和我招呼。

“快躺下，別碰痛了伤口。”我走上去扶住他的身子，帮他躺好。

“你叫什么？是給民团打坏的？”我問他，一面給他检查伤口。伤口挺厉害，骨头也打坏了。

“我叫曹国焯，在省立第七中学念書，这次回乡下去过暑假，給民团打伤了。”提到这事，他脸上露出生气的神色。

“民团为什么打你啊？”我問。

“这帮土匪！他們經常打人的。他們在乡下搶东西，打罵老百姓，什么坏事都干，誰要是反对他們，就說你是共产党。他們說我也是共产党，拿起枪就給了我一家伙！”曹国焯越說越气愤，“我心想：可惜我还不是共产党，要不然一个个都把你們宰了！”

“总有一天，我们会消灭他们的！”那个战士说。

“这位同志说得对，他们的日子长不了。”我说。

我怕曹国焯累了，不再和他多说话，叫他好好休养，就走出了病房。我想，这青年人倒有股劲，挺惹人爱。我叫陈炳辉好好照顾他。

三个多月后，曹国焯的伤口长好了，因为骨头断了，走起路来有点跛。

有一天，我走过病房，看见他两只手里端了两碗饭，正往病房里走。我开玩笑地说：“怎么，怕饭没有了，还用两个碗盛。”

“不是我吃的，是给红军同志盛的。”曹国焯站住说。

“哦！这么说是我错怪你了，你是在义务劳动。”我笑着说，“你的腿怎么样了？可以出院了吧？”

“傅院长，我正要找你谈这个事，请你等一等。”他把饭很快送到屋里，出来说：“我不走了。”

“不走了？”我奇怪起来，“你的伤好了。”

“我不想走了，我想在这里跟你学医，你说行吗？”曹国焯认真地说。

“你怎么想起学医来了？你不是在学校念书吗？”我招呼他到办公室去谈。

“不去念书了，想学医，象你们一样，给红军伤病员看病。这工作多有意思！”曹国焯跟在我后面，一边走一边说。

“你想得很好。”我說。

走进办公室，我請他坐下，严肃地对他说：“学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不会半途而废？”

曹国焯忽地站起来，象受了侮辱一样，脸红红的說：“傅院长，我决不是那种人！”

“那好！”我很高兴，但又想起了他的家，問他：“你父亲能答应嗎？”

“他管不了我。”提起父亲，曹国焯象有滿肚子意見，“有这么个父亲，我真倒霉，他脑子里尽盘算怎样多收些租米、多弄些錢，把农民可害苦了。以前，我还不懂这些，以为他挺好，养着我。紅軍来后，經常講地主怎么剝削农民，慢慢地，我明白了，原来我父亲是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我怎么能和他走一条路呢！你收下我吧！”

我想了想我們医院里的情况，自从去年紅軍消灭了国民党郭鳳鳴部队、解放了汀州后，我們医院里有些医务人员觉悟低，有的上广州，有的到上海去，不願呆在汀州了。医院里又接收了很多紅軍伤病員，人手少，照顧不过来，很需要增加些人。曹国焯的思想較进步，对紅軍挺好，收下他，对我們工作有好处。我想了一会，对他說：“好吧！你就在我們医院里学医。”

“你答应了？”曹国焯兴奋地問。

“答应了。”我笑着說，“回头我叫陈炳輝带你上我家去，你就住在我家，和陈炳輝一起。”

“謝謝你！謝謝你！”他激動得抓住我的手說。

曹國煌就這樣留在我們醫院里了。

醫院里人手少，曹國煌一面學醫，一面就跟陳炳輝給紅軍傷病員換藥，洗傷口，做些簡單的護理工作。陳炳輝比曹國煌還小三歲，才十八。兩個人都住在我家，和我睡一間房子，我和陳炳輝合睡一張木床，曹國煌睡一張行軍床。他倆同進同出，不久成了好朋友，在工作上，他倆都很積極，對紅軍傷病員特別關心，不分白天黑夜地照顧着。那時我們醫院里有個赤衛隊隊長，負了重傷，身上、手臂上、腿上好幾處傷口都化了膿，一走近他身邊，就有一股強烈的臭味，陳炳輝和曹國煌每天細心地給他排膿、洗傷口、上藥，換下的滿是膿血的綳帶，也由他倆洗，這樣做，他倆毫無怨言。有次陳炳輝逗曹國煌說：“你給紅軍傷員看了病，白軍來了要殺頭，你不怕？”曹國煌說：“怕就不來學醫了！”

那時汀州是游擊區，有時紅軍來了，有時紅軍又走了；紅軍一走，白軍就來了。曹國煌來了幾個月後，聽說紅軍又要走了，我們就緊張地讓一部分傷口快好的紅軍傷員出了院；又給一部分傷員化裝成老百姓，把他們送到鄉下老百姓家去養傷；還有少數重傷員，沒法轉移的，仍住在醫院里。為了掩護他們，白軍一到，我就利用基督教會醫院院長的身份，去拜訪了縣長，聲明我們醫院是教會醫院，做慈善事業，“國軍”來了給“國軍”看病，紅軍來了

給紅軍看病；又說明我們醫院里還有幾個紅軍傷員，請縣長和“國軍”方面聯繫，決不能親捕殺他們，否則就違反了世界紅十字會規章。那個縣長以為我真的只是做慈善事業，又不敢違反國際規章，只得答應了我的要求。

在家里，我也收拾了一下，把一些該收藏起來的東西都收藏好了。

自從白軍一來，曹國煌每天從醫院回來，不象過去那樣高興了，老是皺着眉。一天夜里，我問他：“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實在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曹國煌恨恨地說。

“什麼看不下去了？”我問。

“傅院長，白軍一到，我們汀州就成了陰慘地獄！你看，他們不是搶劫，就是殺人。今天，我從醫院回來，又看見他們在抓人了！”曹國煌坐在行軍床上說。

“是啊！國民黨部隊做這些禍國殃民的事，是叫人氣憤。”我坐在藤椅上，自言自語地說，“白軍一來，更感到離不開紅軍了！”

“……”曹國煌雙肘抵在膝蓋上，雙手抱住了頭，把一頭烏黑的頭髮弄得亂蓬蓬的，默默地想着什麼。

我走過去，挨着他坐在行軍床上，對他說：“光氣憤是不夠的，我們應該鬥爭啊！”

“鬥爭？怎麼鬥爭呢？”曹國煌抬起頭，望着我問。

這時候，陳炳輝也從醫院里回來了，听了我們的話，

潘进來說：“斗争就是斗争嘛，做对红军有利的事，对白军不利的事，这就是斗争，傅院长，你说对吗？”

“可以这么说。”我点点头。

“你别看白军凶得象恶狼，它是欺软怕硬，去年的事，现在我还忘不了。”陈炳辉說。

“去年什么事？”曹国焯好奇地問。

“去年，白军的一个排长带了十几个士兵来抓傅院长，說他是共产党，可是沒搜查到証据，只得走了。临走时，搶走了一块表、几十块大洋和一把布伞。当时，傅院长就把他們拦住了，要他們还出这些东西，否則就要到‘蔣司令員’那里去告他們。”陈炳辉嘆一笑說：“其实傅院长根本不認識什么蔣司令員、醋司令員的，只是吓吓他們。誰知那个排长来了个紧急集合，叫几个士兵解开衣服，一查，沒有东西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冒一头汗，东西哪里去了？那个排长态度强硬起来，可是傅院长比他更硬，肯定是他們拿了东西，不还就要去告。那个排长沒法，临走时偷偷地把大洋丢在墙角里了。第二天，白军的一个团长还來說好話，說什么‘弟兄們参差不齐，看在鄙人脸上，別去告了。’后来差一个馬弁送还了表和布伞。”

“干得好！”曹国焯跳起来兴奋地說，“白军一个子兒也沒撈到。”

“当时我所以这样做，倒不是为了那些錢和东西，是怕以后他們再来找我麻煩。”我解釋道，“当然这是件小事。”

我們的斗争是复杂的。对敌人，我們要恨，但光恨是不行的，还要冷靜地找各种机会和它斗争，这才对人民有利。”

“傅院长、小陈，你們說得对！你們給了我很大的启发。”曹国煌的眼睛閃着光說。

过了几天，我从書柜的夹板里面，拿出瞿秋白同志著的“新社会观”，借給曹国煌看。

曹国煌一下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每天晚上回来，就在灯光下讀到深夜，連續地讀了几遍。

那天夜里，我問他：“这本书怎么样？”

“这真是本好书！”曹国煌怀着深情，拿着这本书說，“讀了这本书，我的眼睛好象亮了很多，我知道了許多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我看到了摆在我前面的一条光明大道。它就象一把神話里的鑰匙，打开了我脑子里的一把铁鎖，我了解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我了解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多么伟大的事业！我們要为了人民大众，創造一个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候，阶级消灭了，剝削消灭了，人人劳动，人人过幸福生活，哎哈！真是太美了！”

“这确实是本好书啊！我曾經讀了几遍，它引导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人生道路。我一直把它保存着，白軍几次来，这本书都沒被他們搜查去。”我說，“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理想！南昌起义后，我看到了共产

党所领导的紅軍，正是一支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的斗争的革命武装，它不惜一切地和敌人英勇斗争，越打越大，我从心里爱上了它。”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曹国焯說。

“我们既然有了正确理想，就要为实现它而斗争！目前，我们就要好好地支援紅軍，这就是革命工作。”我說。

曹国焯连连点头。

紅軍走后，我們的很多活动只能轉入地下了。紅軍方面和我联系的只有一个人，叫罗旭东，在邮局里当邮差，是个共产党员。每天，他背个邮包，給我送来四份报纸。这时候，他就趁机向我作些指示，我也向他彙报情况。他来的次数多了，曹国焯和陈炳輝也和他熟了，他一来，只要他两人在，就自动到門口去放哨，防备意外。

我們的四份报纸，都是送給毛委員看的。当时，敌人封锁了我們的消息，紅軍又没有电台，毛委員要了解国内外形势，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发展革命力量，很需要敌人的报纸作参考。为了夺取敌人的报纸，过去曾派一个团的紅軍去和敌人作战。一九二九年，紅軍到了汀州，我了解到报纸的重要意义，就訂了上海的“申报”、“新聞报”，广东的“工商日报”、“超然报”，派人送給毛委員。白軍来后，不能公开送了，就秘密送。每隔两三天，我把这些报纸用旧报纸卷起来，里面夹上一张便条：“毛委員：送

上報紙×份。鄭愛群。”鄭愛群是我為了送報紙起的假名，通過秘密交通站送去。毛委員收到報紙後，也經常通過秘密交通站給我寫回信，信上這樣寫着：“×月×日，報紙收到。這樣做很好。毛澤東。”這些回信，大多是毛委員用毛筆寫在毛邊紙上的。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卷報紙，曹國煌問我：“傅院長，你經常寄報紙，給誰寄呀？還卷得這麼好。”

我笑笑，說：“你猜一猜。”

曹國煌想了想，搖搖頭說：“猜不着。”

“給毛委員。”我低聲告訴他。

“給毛委員寄的？”曹國煌驚奇得眼睛睜得大大的。

“是啊！”我笑着說。

我把毛委員怎樣需要看這些報紙告訴了他。他興奮得拿起這卷報紙反來復去地看著。過了一會，他望望我，想說什麼，可是沒有開口。我問他：“你為什麼不說話？”

“傅院長，以後我來卷這些報紙成嗎？”

“成啊！你幫我卷吧！”

由於我對他的信任，曹國煌興奮得臉上掛滿笑容。當時就把已卷好的報紙小心地藏到櫃子裏去了。

我們都睡了，陳炳輝也回來了。曹國煌問我：“傅院長，你見到過毛委員嗎？”

“見到過。”我說。

“在哪裏見到的？”曹國煌羨慕地問。

“我也見到了，就在我們醫院里。去年毛委員到我們醫院來了。”陳炳輝搶着說。

“真的？”曹國煌似乎还有点不相信呢！“毛委員到醫院來干什么？”

“誰還騙你？”陳炳輝說，“他是來看紅軍傷病員的。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呢：高高的个子，穿一身灰軍裝，光腳穿一雙舊膠鞋，見了我們，就和我們握手。他去看望傷病員同志，我偷偷地跟在他後面。他問傷病員同志傷口怎麼樣？生活上有什么困難？一頓能吃几碗飯？問寒問暖，就象个父亲。”

曹國煌听得出了神，嘴里不断“哦！哦！”地应着。

过了一会，曹國煌惋惜地說：“我要是早來一年，多好啊！”

“怎么？你还嫌民团把你打退了？”陳炳輝故作惊奇地說。

我們听了，都笑起来了。我对曹國煌說：“紅軍很快就会打回来的，那时候，你就可能見到毛委員了。”

“嗯！我也相信，我一定能見到毛委員的！”曹國煌十分有信心地說。

“毛委員可不敢見你。”陳炳輝說。

“为什么？”曹國煌着急地問。

“他怎么忍心讓你早一年挨民团的枪子啊！”

曹國煌知道陳炳輝又在譏笑他，随手在床头拿起一

个铅笔头，扔向陈炳辉，“督”的一声，铅笔头正中陈炳辉的额角。曹国焯哈哈大笑起来，说：“看你还挖苦不挖苦人了！”

“好枪法！”陈炳辉中了铅笔头，还调皮得不让人。

我看看时间晚了，对他俩说：“别闹了，睡吧，明天还有事呢！”随手熄了灯。

从此，曹国焯每隔两三天，吃晚饭时就留下一小团米饭，夜里帮我把报纸整理好，卷紧，用旧报纸封得严严实实的。第二天，我就把报纸交给罗旭东，由他秘密转送给红军的交通站，再送给毛委员。

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我的侄子傅维彬突然来了。他是在去年参加了红军的。

“你怎么来了？”我奇怪地问。

“跟部队打回来了。”傅维彬年轻的脸上露着喜悦说。红军打回来了！

我们都很高兴，马上添了付碗筷，叫他坐下来一起吃饭。我们一面吃一面谈，还没吃完饭，突然听到街上先后响起了两种号声，维彬忽地站起身来，说：“怎么？我们马上要撤退？哎哟！敌人来了？”正要往外走，陈炳辉慌慌张张地走进来，说：“不得了啦，白军把我们家包围了！”

话音刚落，四个白军端着枪进来了，一见到穿红军军衣的维彬，直扑过去。我见事情来得突然，一时无法掩

护他，又不知道白軍的全部来意，急忙向陈炳輝使个眼色，說：“还不快拿药箱！王司令員来电话，要我去看病。”

陈炳輝連忙拿起药箱，跟着我往外走。走到門口，見外面有十几个白軍端着刺刀守在門口。有个瘦猴似的白軍狗吠似地喊：“不准出去！”

“去給你們司令員看病。”我瞪了他一眼，故作鎮靜地边說边从刺刀縫里走出去，陈炳輝紧跟着我。那个白軍信以为真，讓开了道。

这一天，我和陈炳輝躲在外面，心慌意乱。夜里，曹国焯来了，他說：“維彬被杀害了！”

原来維彬被逮捕后，在街上就被野兽般的白軍刺了几刀，鮮血流滿了街，但維彬英勇不屈，一路痛罵白軍，当天，就被拉到南教場——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人士的地方，反动派惨无人道地把維彬剖腹杀害了！維彬临死前，还高呼着口号：“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听到了噩訊，我心里悲痛万分。維彬今年才二十多岁，从小就是个好孩子，汀州解放后，自动参加了紅軍，离开了家庭。在部队里，他英勇战斗，完成了各种任务。誰知道他这么年輕就遭到了敌人的毒害！

过了几天，看看家里沒事了，我和陈炳輝回去了。夜里，我們三个人誰也不想睡。曹国焯激憤地說：“国民党反动派簡直是杀人魔王！”

“維彬死得有骨气！”陈炳輝独自默默地說。

“今后的斗争更残酷了，我们应该学习他宁死不屈的精神。”我对他们说。

“可惜你没见过他一面。”陈炳辉对曹国焯说。

“没见过他，可是我已經認識他了！”曹国焯大声地说，“敌人是杀不完我們的，我們一定要給他报仇！”

不久，又传来了我堂弟傅連彪英勇牺牲的消息。他是个共产党员，一直在汀州做地下工作，不幸也被敌人逮捕杀害了。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我們的活动也更隱蔽了。但是隱蔽并不等于消沉，在敌人的心脏里，我們更加积极地工作。

罗旭东还是每天来送报纸，有一次，我跟他談起了曹国焯，我说：“这个青年，一年来思想进步很快，对革命对党都有較高的認識，你看他是不是可以入党？”

罗旭东想了想，说：“他和家庭关系怎样？”

“没有什么联系了。”我说，“自从他学医后，經濟上完全由我負担，他父亲来了信，他也不回信。他和他父亲走的是两条路。”

“好吧！我請示一下上級党再决定。”罗旭东说。

当天，罗旭东又找曹国焯談了一次話。

过了几天，罗旭东来说：上級党批准曹国焯入党。

曹国焯兴奋得竟也睡不着。这天深夜，我从医院回家，見他还没有睡。他見了我，激动地说：“傅院长，我不

知該怎样感謝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是一个剝削階級的子弟，是党把我培养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使我有新的生命。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地为党工作。傅院长，有什么任务，就交給我吧！”

“好！我祝賀你的入党，希望你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我握住他灼热的双手說。

为了做党的工作方便起見，我給曹国煌起了个假名，叫黄为誠。

不久，陈炳輝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一年，敌人越来越疯狂，但是紅軍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各个击破敌人，消灭敌人，紅軍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在医药上的需要也增多了。当时紅軍所需的医药，除了在战斗中从敌人手里夺取外，主要的来源就是我們通过邮局，从上海邮寄来，再設法运給紅軍。但是自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汀州成了巩固的苏維埃区以后，敌人对我們实行了經濟上的严密封鎖，通过邮局只能邮寄小包药械，不能滿足紅軍的需要，我就想派人到上海去买。派誰去呢？我想到了曹国煌。

我把他从医院里叫回来，跟他講了这件事。当然，这是个非常危險的任务。当时，白軍在碼头上查到了带私盐的人，輕則沒收，关进监牢，重的就要枪毙。从白区带药品，就更困难了。但曹国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跟他講了去上海的路綫：“你从这里出发，先到上杭、峰市、汕头再到上海。到了上海，去找华英葯房，我和他們的經理有来往，你就在那里买葯。回来的时候，路上千万要小心，要随机应变，灵活些。”

“好！”曹国煌答得很干脆，細心地記住我的話。

我又把一路上軍閥、土匪等分布的情况告訴了他，把要买的葯和一些医疗用具对他說了。

“什么时候动身？”曹国煌問我。

“明天就走吧！你准备一下。”

“好，我就准备。”

第二天，曹国煌脫下了平日穿的学生装，換上了从家里带来的长袍，布鞋換了皮鞋。陈炳輝也帮着給他打扮，还开玩笑說：“嘿！成了一位少爷了！”我开了一张汇丰銀行的支票給他。

他提了一只皮箱就要走了，我又一次囑咐他：“絕對保守秘密，完成任务！”

“放心吧！傅院长，我一定完成任务！”曹国煌說。

曹国煌走后，我心里每天惦着他。

約摸过了一个来月，他回来了！我見他一脸高兴的神情，猜想事情大概很順利，但还是急忙把他叫到房間里去，关上門，問他：“怎么样？”

“葯已經到了永安，过一个星期就能运到了。”曹国煌

放下手里的皮箱說。

“还順利嗎？”

“还順利。”

“路上情况怎样？”

“敌人封鎖得很紧。在上海买药倒还容易，过了福州，路上也还好走，越接近苏区，敌人查得越紧。”

我倒了杯开水給他，說：“喝点水，細細談談。”

“药到了延平，被国民党收編师长卢兴邦的部下拦住了，說什么也不讓过。”曹国焯一口喝干了一杯水，喘了口气說。

“那你怎么办？”

“我对他們說，我是汀州教会医院的，这药是运去做慈善事业的，可是他們还是不放。后来，我去托当地一所教会医院的院长帮忙，那个院长認識你，他到卢兴邦那里去証明了一下，才放过来。”

“哦！这个医院还帮了我們一个忙。”

“到了永安，又碰到了国民党收編旅长卢新民的部下，他們又把我拦住了。幸好这次走以前，你跟我說了这些家伙的情况，我知道他和你認識，你不是說，你在福音医院給英国人挤牛奶的时候，卢新民在医院里看牛嗎？我就拿了你的名片，买了礼物，送过去。他見了礼物，就放我过来了。”

“你做得好。”我高兴极了，叫我家里人特地做了几样

好菜慰問了曹国焯。

两星期后，药来了，一起有二十多木箱，每箱有一二百斤重。我叫陈炳辉去买来三把二尺长的铁钳，和曹国焯、陈炳辉一起，起开木箱上的铁钉和铁皮，拿出一包包、一瓶瓶药品和医疗用具。这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了！看到这些东西，就好像看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一样。这里面，有内科用药奎宁及各种注射药等，外科用药碘片、漂白粉、硼酸、硼酸绒布、纱布等。医疗用具中主要是手术家具。这些正是红军伤病员急需的东西啊！

我马上去和领导上联系，先后由杨志诚和楊立三同志带了两大批药到红军中去。

我们打了第一个胜仗。

不久，我又派曹国焯二次去上海买药。

这次，曹国焯慌慌张张地回来对我说：“糟糕了！药运到广东，给没收了。”

“没收了？”我着急地问。“在广东哪里给没收的？”

“我从上海买了药，就交给大货船托运，船到了汕头，换了从汕头到三河壩的货船，到三河壩，药还在，可是从三河壩一到大浦，我到码头去领，码头上的人说，半路上药给一支部队没收了。”曹国焯一口气说。

“是在大浦给没收的？”

“是啊！”

我放了心，对曹国焯说：“是在大浦没收的就不要紧，

大浦住着我們的東江紅軍游擊隊，他們收下了，還省得我們送了！”

“真的？”曹國煌跳起來大聲說，“可把我急壞了！”

一九三一年秋天，譚震林同志到我家來，對我說：“你們買的两批藥對部隊幫助很大呵！你們是不是可以成立幾個藥房，把這個工作經常化起來呢？”

我說：“好的，你看在哪裏開藥房合適？”

“藥還得到上海去買，上海到這裏，中間要經過汕頭、峰市、上杭，我們就在上海、汕頭、峰市、上杭這四個地方開四個藥房，往這裏運藥，還可做秘密交通站。你看怎麼樣？”譚震林同志說。

“這樣做很好。”我說。

“要派可靠的人去。”

我答應了。決定還是派曹國煌去上海買藥，然後讓他到峰市去開藥房；另派一個同志到上杭去，先開兩個藥房。

當時，峰市、上杭都是國民黨統治區，到那裏去安據點，是危險的。为了不引起敵人的懷疑，我去拜訪了汀州一個姓邱的大商人，他在汀州開過載行^①，峰市、上杭都有他開的店，名聲很大，而且十分愛財。我約他合股開藥房，說是跟紅軍做買賣，賺紅軍的錢。我用高額利潤吸引他，他一口答應了。

① 載行，就是批發商行。

我們就这样干起来了。在峰市、上杭租了房子，由姓邱的找了鋪保，开了两个葯房。曹国焯在峰市的葯房中当了医生兼經理，一面卖葯，一面还看病。但卖的葯都是一般的葯，重要的葯都偷偷地运到汀州来。

紅軍的医葯有了經常的保証。

曹国焯有时也回来。一次，他随身带来了些針葯。他知道毛主席需要这种葯，对我說：“傅院长，請你轉給毛主席。”

“我一定送去。”

我問他峰市的情况，他說：“白軍很疯狂，象过去在汀州一样，到处搶劫、抓人、杀人。”

“你要小心！”

“你放心吧！不要紧的。”曹国焯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說：“我在峰市碰到了一个人，姓周，是从汀州逃亡出去的地主。”

“他看到你了吗？”

“看到了。”

“有危险吗？”

“不要紧，他知道我們和姓邱的合股做生意是为了賺錢的！”曹国焯笑起来了。

“要特別小心！发现危险就往回跑。”我囑咐他。

他点了点头。

曹国焯常常回来一两天，就又回去了。

一九三二年秋，一天傍晚，那个姓邱的商人突然跑到我家来，说：“糟了！糟了！‘国军’把曹国焯抓去了！”

就象一桶冷水突然浇在我头上一样，我全身一抖，急问：“怎么抓去的？”

“‘国军’说他是共产党，给红军运药，把店都封了！你可把我害苦了！我的本钱全丢了！”姓邱的哭丧着脸说。

“你知道曹国焯现在关在哪里？”

“解到上杭就枪毙了！”

“枪毙了！”我一听他的话，一时象晴天打了个霹靂，我惊得几乎站不住了，又象有几千只针一下刺进了我的心窝，我感到心直发抖，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悲痛。

“听说，曹国焯死以前，敌人还上了好几种刑，要口供，这小子平日不声不响，这时候可真挺得住，什么也不讲，这样才枪毙了的。”姓邱的在一边说，“临枪毙那天，‘国军’押着他走到刑场去，他在街上一路喊口号：‘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共产党万岁！’‘国军’用刺刀制止他，他象没看到一样，还是喊。这件事震动了上杭全市，好多市民看得都哭了，说这么个年轻勇敢的人给害了，真可惜！现在上杭老百姓中都传说那里出了很多共产党，‘国军’都有点寒心了，天一黑就戒严。”

“曹国焯，你死得英勇，你没有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教育。”我默默地想。

“傅院长，我的本錢，可怎么办呢？”姓邱的还在我耳朵边唠叨他的臭本錢。

“本錢，本錢，我們的本錢比你的大得多！”我气憤地对他說，“以后再說吧！”

姓邱的沒法，就走了。

我把不幸的消息告訴了陈炳輝，他听了，悲痛得半天沒說出一句話来。他坐到空空的行軍床上，呆呆地望着这张床，止不住涌出了眼泪。

“总有一天，我們要把敌人消灭得一个不留，叫敌人用血来还这笔血債！”陈炳輝脸上滚着泪珠，眼睛里射出怒火，憤憤地說。

“我們一定要討回这笔血債的！”

我和陈炳輝把曹国焯遗下的唯一的東西——一张全身照片，挂在房間里，默默地悼念他。

我望着照片，一看到那个熟悉的方脸，那一头烏黑的头发，那对发亮的眼睛，那眉宇間透露出来的带点稚气的坚毅的神气……我的眼眶就湿了。这是一个多么年輕而坚强的人啊！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他毫不吝惜地献出了自己的珍貴的革命的青春。

亲爱的同志！你的生命虽然短促，但却永远放射着紅光，照耀着后人前进的道路。

党为了紀念曹国焯同志，把烈士的照片挂到江西中央烈士館里，讓人們学习他忠貞的革命精神。

南昌起义的伤员

南昌起义的时候，我正在福建长汀城内的福音医院当院长。

这所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的浪潮激荡了这座山区的城市，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我也激于民族义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这时，英国医生被人民的声威吓跑了，群众就推举我当了院长。

我曾经侥幸地读到瞿秋白同志著作的“新社会观”，这本书使我开始懂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都是劳苦大众的敌人。我懂得了，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完全解除劳苦大众颈项上的枷锁，还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所以，当我一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并且从一些思想进步的朋友口中知道了起义原因的时候，我就特别关心这支革命武装的进展情况。

八月中旬，听说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该赶快作好

接受伤员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军，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那时，我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我，说是起义部队的副官。他一说明来意，我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那位军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八月下旬，起义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于田市和会昌，先后打了两大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三个人。三个人要给三百个人动手术，还要进行其他治疗，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很高，白天黑夜连着干，从没一个人说累。只是我们每个人心中还有一点小矛盾：因为这时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沸腾的欢呼声，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象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

后来，我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去听报告。我立刻变成了一个最幸运的人，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并且囑

附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来都得講！

那天天气很好，滿街是耀眼的阳光。我冒着暑热慢慢步行着，貪婪地注視着街上的一切：革命軍事委员会的布告，用石灰水新写在牆上的标語，粘貼在电綫杆上的传单……巷口牆角，人們东一群西一簇，在听政工人員演講。許多景象都使我感到新鮮、亲切。

报告会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的。礼堂里大約坐着三四百人。这次我听到了郭沫若和恽代英同志的报告。郭沫若同志第一句話說：“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他的和藹可亲的姿态和热情而幽默的語言，吸引了許多青年热望革命的心情。恽代英同志身材瘦小，精神却十分飽滿，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制服，頸項上系着鮮艳的紅領巾，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說起話来，声音响亮，充滿感情，加上有力的手势，使听众們的情緒由不得被他紧紧抓住，和他一同悲憤、激昂。我的心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动。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医院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全部告訴了其他医生和护士們。他們也很激动。那时，护理人员大多是青年男女教員、学生，他們不但沒有經驗，許多人一看见血就发抖，一看见脓就要呕吐；可是現在都搶着替伤员洗伤上药，喂水喂飯。武昌大学学生张成荣、關宝兴放暑假回来，也参加了护理工作，一連几夜不睡，眼睛熬得通紅。那时候，南昌起义是大家最关心的

事情，有些伤势較輕的伤員就时常講起义的故事給大家听，有的講得入了神，不禁眉飞色舞，护士們忘了手里的工作，重伤員也忘記了疼痛。屋子里一时靜寂无声，沉浸在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思念中。

起义軍營长陈賡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敵軍子弹打断了，住在医院附近的新安樓。我們去替他医治时，他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黃，身体非常虛弱，伤腿肿得很粗，紅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我的心也止不住顫动。可是，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滿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譚惠英說話，病房里充滿着他的朗朗的笑声。那时候，我看着他的年輕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到：象这样一位年輕、勇敢、有才干的革命軍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伤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針，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鮮牛奶讓給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持久而謹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賡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存下来了。

那时，起义軍二十軍三師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樓上，我也經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紀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虛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象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較好以后，常愛找些話和我談



談，問我多大年紀了？做醫生幾年了？等等。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他已經五十歲了，那年剛剛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也許當時我的驚異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說：“五十歲，正是做事業的時候。我起碼還能有三四十年好為黨工作呢！”那年我才三十三歲，可是有時自己竟想到：青年時代已經過去了。當我站在這位年已半百但還剛剛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產黨員面前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這種想法太可笑了，同時，也有一種新的強烈的願望，在我心中產生。

南昌起義部隊的第一批傷員，有的不久就隨部隊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醫院里繼續醫治，我并向商人募捐，維持他們的生活，想盡各種方法保護他們，以後他們也陸續出院歸隊了。陳賡同志帶着沒有痊癒的傷腿，徐特立同志帶着他才退燒的身體，都走了。可是他們樂觀、堅定的笑容，他們清朗、有力的話聲，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统一书号10020·1309
定 价 0.22元